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十三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两弹一星飞上天	(1)
卧薪尝胆造核武反霸权： 赴汤蹈火两弹一星飞上天。	(1)
联大席位喜恢复	(17)
悲尽欢来看龙年	(34)
“四人帮”的覆灭与邓小平的复出	(49)
第二次复出，邓小平得益于他是 中央苏区的“毛派的头子”	(49)
复出后的两年中，邓小平多次挫败“四人帮”	(54)
宁可再次被打倒，也不愿为 文化大革命树碑立传	(60)
民心不可欺：“总理遗言”竟成“头号反革命事件”	(66)
“四人帮”的覆灭	(71)
过渡时期的政治人物	(7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85)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85)
以人民的名义审判	(93)
重新评价历史	(97)

第三代集体领导的核心是江泽民总书记	(103)
《人民日报》与天安门事件	(109)
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说，	
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	(109)
王洪文要记者“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	(112)
《情况汇编清样》欺骗主席、中央，并诬	
“邓小平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	(115)
篡改事实真相，炮制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	(118)
中央派迟浩田进驻报社，领导报社清查工作	(123)
粉碎江青“四人帮”的斗争	(129)
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态度恶劣	(129)
毛主席突然休克	(135)
江青是怎样为自己的后路做准备的	(137)
三箭齐发，只瞄一箭	(139)
主席最反对拉帮结伙	(142)
伸手要官要权	(146)
穷于心计抓军队	(153)
江青大闹政治局	(156)
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16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64)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164)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167)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169)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172)

两弹一星飞上天

卧薪尝胆造核武反霸权： 赴汤蹈火两弹一星飞上天。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早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就下决心发展核武器。他要求中国的科学家们，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尽快地研制出原子弹。他说：“只有我们自己也掌握了核武器，才能更好地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支持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科技人员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使中国的国防核工业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研制核武器，是在“冷战时代”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下被迫进行的。新中国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就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朝鲜战争期间，中美更处于紧张的直接对抗之中，美国不断发出核威胁的信号，不断利用原子弹进行核讹诈。这一切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最高决策层，在 50 年代就开始考虑制造原子弹。

早在 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时，就谈论过原子弹。1951年10月，同中国友好的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在巴黎约见了即将回国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请他回国后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自己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以支持中闷的核物理研究。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长李四光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他们说：“今天，请你们给我们上一课，我们这些人当你们的小学生。”李四光从提包里取出了一块黑色的铀矿石，说：“就是这样一块矿石，经过提炼和制作后得到的东西，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毛泽东兴趣盎然，拿过矿石察看了一番，又让在座的各位中央领导人传看。

李四光汇报完后，钱三强把研究所自制的射线探测器放在桌子上，又把一块放射源放在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探测器立即发出哗哗的响声。毛泽东也试了试，然后笑着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为打破核垄断，我们也要下决心搞自己的核武器。”

同年3月，毛泽东又先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上指出，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1958年毛泽东在军委会上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

好吧，我们就下决心搞一点吧！”

在这之后，1956年2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替火箭，导弹和后来所称的航天事业。《意见书》提出了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计划和具体研制步骤，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听取钱学森的汇报，决定由聂荣臻元帅负责组建“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火箭，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5月10日，聂帅向中央建议组建我国导弹管理和研究机构。彭德怀、叶剑英等几位老帅积极支持。于是，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正式行文，先后做出了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的决策。一个多月以后，钱学森又在中国科学院的统一组织下，领衔主持制定了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远景规划。

1956年的春天，对中国科技界来说，是光辉灿烂的春天。1月2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1月25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国人民应该有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过了5天，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部门，在4月份

以前制订出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投入了这一规划的制订工作。周恩来指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发展“两弹”，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片空白，既无资料，更无经验。开始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高兴地对大家说：“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建立起来。有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尚好。而且，当时正是苏联政界人物在交迭更替之中。在195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被解职。不久，朱可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代之以马林诺夫斯基出任国防部长。在风云变幻的形势下，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力图与邻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修好，不但理论的论争有所收敛，而且在新技术援助方面也出现了松动迹象。因此，当聂荣臻副总理率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时，两国政府于10月15日签订《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一〇·一五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方

在 1957 年至 1961 年年底，将供应我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我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

然而，赫鲁政府并未认真执行这一协定，就是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苏联政府也是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事实上，从 1958 年下半年起，中苏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了。到了 1959 年 9 月，我国国防部五院在莫斯科与苏方进行设备移交的谈判，按协议，苏方应供给我 100 吨不锈钢材，苏方竟翻脸不认账了。实际上在这年的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国际局势，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在 1957 年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随后，他们实际上中断了对我国的援助。一些应到而未到的图纸资料的样品都卡住不给了。那只曾经伸出来的友谊之手又缩了回去。

到了 1960 年，事态发展更为严重。在 6 月 24 日至 26 日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共对中共进行了全面攻击。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突然通知我国，决定自 1960 年 7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的一个月内，撤走在我国帮助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同我国签订的 343 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 257 个科技合同。赫鲁晓夫恶毒攻击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连裤子都穿不上！”当时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的核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在思考。“苏联专家撤走了，这是预料中的事。只不过

事情来得早了些，突然了些。”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淦昌、钱学森、邓稼先及一批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坚定地站在党的一边，为国家民族分忧、争气，把自己的命运与炎黄子孙的祸福，中华民族的安危融为一体，面对严峻的考验，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这种可贵的精神顿时使聂荣臻在尊重与信赖的情感上又平添了几分敬意。“国难识忠良啊！”他说：“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正直知识分子的美德呀！”

聂荣臻在自己家里举行的一次宴请科学家的家宴上，动情地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以后就靠你们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一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悲壮，一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豪气，充满了整个宴会厅。虽然没有美味佳肴，只有四个菜，然而这次宴会却给人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聂帅讲话的精神，成了鼓舞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巨大推动力量。

苏联断援后，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当时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说：“当了裤子也要把它们（两弹）搞上去，否则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因为没有这个吓人的东西，人家就看不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就难以大振。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尽快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

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中国的科学家们是不辱自己使

命的。就在苏联专家撤走不足一个月后，中国的第一枚导弹就在1960年11月5日发射成功了。聂荣臻对此高兴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贺龙元帅用烟斗敲着桌子说：“赫鲁晓夫要把我们的‘两弹一星’扼杀在摇篮里，休想！‘卧薪尝胆，发奋图强’，这个口号要叫得响响的，叫得敌人发抖！”

毛泽东也向科学家热烈祝贺，他说：“就这么干！不断往上飞，一直飞到月亮上去，把嫦娥请回到人间来。”

为了尽快地研制出中国的原子弹，中国的科学家们不仅承受着工作中的各种艰难困苦，而且为了保密，还要长期在深山或大戈壁隐名埋姓。在一次座谈会上，聂荣臻提出：“为了造原子弹，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王承书马上说：“我愿意！”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杨承宗：“义不容辞！”邓稼先：“为了它，死也值得！”……这就是中国的科学家们！

然而，研制原子弹，谈何容易！既没有图纸，又没有资料，更没有经验，困难是可想而知。但是，所有的难题，都被既坚毅而又聪明的中国科学家们一个一个地解决了。

为了争取时间，苏联一断援，聂荣臻元帅即刻提出研制新型材料的任务。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一文件时再次提出，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原料、材料的基础上，必须下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最急需

要解决的关键技术有三个：第一是氟油问题。苏联断援后，受影响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工厂就停顿，因此氟油就成了必须攻克的难关。第二是“真空阀门”问题。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然后把铀 235 浓缩起来。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必须是高能炸药。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1960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听取聂荣臻和国防科委关于研制新型材料的汇报，当场批准正式组成由国家科委牵头的新技术材料小组，统筹安排，协调解决新型材料研制中的问题。会后，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国家计委程子华副主任多次亲自过问、审查、落实。经过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和科技人员与广大职工的努力攻关，国家急需的 96 个项目，都如期保质保量地建成投产，拿出了合格产品。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二机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在 1964 年或不迟于 1965 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两年规划。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审阅后附了一个报告，提出力争在 1964 年实现规划的要求，并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原子能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保证这一规划的顺利完成。1962 年 11 月 3 日，毛泽东指示：“很好，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经过多方的协作努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64 年 10 月 16 日清晨晴空万里，是罗布泊一个少有的好天气，原子弹被安全地吊上矗立于罗布泊爆

炸中心的 102 米高的铁塔上。在起爆前三天，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他让科学家周光召再计算一下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并作出书面报告。周光召报告说：“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失败概率小于万分之一。”周总理最后笑着说：“太好了，我报告毛主席。”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原子弹按照预定的时间——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爆炸了。顿时，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我国罗布泊上空冉冉升起，它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火焰。一瞬间，那巨大的蘑菇云又变成奇异的绿色，天崩地裂，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巨响。历史应记住这一辉煌的时刻，它宣告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核垄断的破产！

说来也巧，中国核爆炸的那一天，正是赫鲁晓夫下台的那一天。10 月 16 日，苏共中央全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解除赫鲁晓夫一切职务。中国核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国外，顿时引起轩然大波。第三世界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普遍感到欢欣鼓舞；但一些西方国家的首脑却瞠目结舌。当天下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把一张蓝色卡片递给约翰逊总统，并告诉他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震级当量为巧万吨级。约翰逊的脸色苍白了，他的手一抖，那张蓝色卡片掉在地下。他喃喃自语地说：“比美国科学家预料的要早五年，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讲的提前了 10 年。”

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后，毛泽东决定尽快实现原子弹武器化。经过科学家们的努力，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导弹、原子弹的“两弹结合”。在一切准备工作就序之后，在正

式发射之前，毛泽东主席请来聂荣臻元帅，并当面对他说：“当年闹革命是逼上梁山；今天，在自己的国土上搞导弹核武器试验，也是逼上梁山。有什么办法呢？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一点，没有那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我说：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赫鲁晓夫说我们20年搞不出原子弹，结果呢？四年多就搞出来了。可人家又说你，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还是不算数，嘲笑我们是‘有弹无枪’。好吧，现在我同意，不想干，也得干，非干不可了！聂老总，你这次去（试验基地），就是要把弹装上枪，打出去，看看我们中国人到底算数不算数！”

聂荣臻来到马兰基地，对发射团的全体官兵激动地说：“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一场神圣的战斗就要开始了！为了这一天，中华民族做了一百年的梦，中国人民发愤图强，流血牺牲，英勇奋斗了一百年！我作为一个老兵，代表死去的和活着的战士，向你们致敬！祝你们成功！”“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天空，在大戈壁上空响彻着。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一枚带着核弹头的导弹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在高空中转弯向西飞行，头弹分离后，按预定弹道飞向弹着区。在894公里罗布泊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这一试验的圆满成功，使一贯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再次受到巨大的震惊。他们深知，从这天起，中国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人们欢呼跳跃，握手拥抱。聂荣臻和钱学森紧紧拥抱，热泪滚滚。大家欢呼：“我们成

功了！我们成功了”

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为实现“两弹结合”立了大功。钱学森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最好的学生。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建立是钱学森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他亲自制定了我国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

钱学森自任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后，就迅速聚集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开始攻关火箭。经过不懈努力，第一枚导弹于1960年试射成功。但钱学森认为，第一枚导弹射程太短，更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和氢弹。钱学森提出，一定要进一步研制高能燃料，加大它的推力、速度。他说：“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

毛泽东支持钱学森要搞人造卫星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抛两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量是184磅。而美国的“探险者一号”只有18磅。毛泽东早就希望有自己的人造卫星，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造卫星接连升空后，毛泽东感慨颇多。他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

人类今娴上太空，
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尽扫鬻蚊日，
公祭勿忘告马翁。

众所周知，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研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人造卫星的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不再受列强的欺侮，毛泽东决心依靠中国科学家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誓死也要把“两弹一星”搞上去。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并实现“两弹结合”后，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任务。他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从此，王淦昌又带领一批科学家，一头钻进了制造氢弹的技术攻关中。仍是大漠荒野，仍是酷日风沙，追赶太阳的人，是永远注定要与荒野、酷日、风沙打交道的。这是祖国的需要，是历史的抉择！

1967年6月17日，又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更大的反响。十几年以后，法国一位著名的核科学家到中国访问，向中国的同行打听：“你们的氢弹搞得这么快，赶在我们的前头爆炸成功了，到底有什么诀窍？当时，戴高乐总统感到非常震惊，还当面批评了我们。”戴高乐的疑问不是没有理由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一向被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却仅用了2年零7个月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奇迹！对此，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氢弹有很大成绩，

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他撤走了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随着氢弹的研制成功，人造卫星和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进一步加快起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人造卫星论证会上，科学院长郭沫若在热烈的掌声中，朗诵了他写给钱学森的一首赞颂诗。诗中写道：

大火无心云外流，
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
西子湖畔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
参加规划献宏谠。
从兹二十年间事，
跨箭相继星际游。

经过钱学森、赵九章、张钰哲等所有科研人员的努力攻关和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了。发射之前，周恩来总理特地从中南海西花厅打来电话：“毛主席已经批准今天晚上发射卫星！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1970年4月24日21点34分。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站在潜望镜前的“○”号发射指挥员杨桓下达了点火的命令。火箭发动机顿时喷出桔红色的火焰，“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了！人们欢呼跳跃，紧紧拥抱。钱学森哭了，任新

民哭了，孙家栋哭了……卫星飞过圆明园遗址上空，飞过天安门上空，飞过香港、澳门、台湾上空，飞过美国“自由女神”像上空，飞过鸦片战争抗击英军的炮台上空……在天上的《东方红》乐曲与地上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中，天上人间，交织成一首独特而美妙的“中国交响乐”。

继“东方红”卫星上天之后，1971年9月9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在万众欢呼声中，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从此，中国继美、苏、法、英之后，也成了世界上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谈到在海军建设上的这一重大成就，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都在欺侮我们，讥笑我们，可我们中国人就是不信邪，原子弹爆炸了，导弹上天了，氢弹核武器有了，卫星也上天了，可是核潜艇呢？当年，毛主席说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可是才几年时间啊，经过全体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努力，就提前9990年，实现了毛主席说的‘一万年’造出核潜艇的计划！”

回顾在新中国50年的光辉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50年代，中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振奋了国威、军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邓小平对此曾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为了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国战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 23 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这 23 位科技专家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1999年9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江泽民强调说：“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光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江泽民最后号召全国军民和全国科技人员，要坚持发扬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的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奋斗精神，全面贯彻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继续同心协力地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不断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就在中国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并取得“两弹一星”上天的重大成就的时候，1971年10月，在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下，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联大席位喜恢复

霸权主义休猖狂，
革命潮流不可当；
中国席位得恢复，
联大会上正气扬。

1971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驱逐蒋帮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席位。这是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是美国操纵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顽固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彻底破产！它反映了各国人民要求同中国友好是大势所趋，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这一历史潮流。

中国本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各种组织的各项权利，理所当然地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来行使，这本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20多年来，美国一直敌视新中国，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妄图蛮横无理地长期将新中国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

在50年代，美国的主要手法是，操纵联合国大会

(简称联大)的多数通过决议：“延期审议(后改为“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

在60年代，美国的手法是操纵联大多数通过决议：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凡“重要问题须由到会及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自1961年起，先由苏联，后由阿尔巴尼亚等国在每届联大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在美国的阻挠、破坏下均未获得通过。

在1970年25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又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经大会表决，51票赞成，49票反对，首次获得多数。但因这届联大通过了美国炮制的“重要问题”提案，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基辛格在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期间，主动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代表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

任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周恩来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在 26 届联大举行前，1971 年 7 月 15 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18 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信中说：“我们奉本国政府之命，谨要求阁下将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 26 届联大的议程。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随函附去解释性备忘录和决议草案。”

这 18 个国家的“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联合国大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

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1年7月15日（北京时间7月16日），中美两国虽然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将访华的公报，但是尼克松政府仍想在联合国玩弄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此，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的声明》。随后，他又指示美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于8月17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份解释性备忘录，鼓吹“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而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中国对美国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22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荒唐的主张，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的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方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

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中国政府深信，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18 国所提出的正义主张终将取得胜利。”

9 月 20 日，第 26 届联大开幕，为了对抗“两阿提案”，美国又伙同日本等国一起，向联合国提出了两项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一项是关于驱逐所谓的“中华民国”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才通过的“重要问题”提案；另一项是既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又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对此，中国政府和外交官员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与美、蒋进行斗争。周恩来接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政界和新闻界人士，揭露美国顽固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阴谋，解释中国的政策，多方争取支持。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先后撰写并向国内外播发了《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及《佐藤反动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等评论文章，对美国以及长期追随美国敌视我国的日本佐藤荣作政府进行揭露和批评。

10 月 18 日，联大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开始专题发言。经过一周的辩论，约 80 个会员国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的情况清楚表明：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越来越不得人心，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国际正义的国家，强烈反对美国及其一小撮追随者继续玩弄花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立即归还给 7 亿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把非法窃据这一席位的蒋介石

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蒋介石预感前途不妙，忙派他的“外交部长”周书楷到纽约活动。周书楷一到纽约便去找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共商大计”。布什见周书楷举止无措，便对他安抚说：“尼克松总统派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为特使，10月12日刚刚访问了台北，他带去了尼克松给蒋介石的信，带去了美国的口头保证。我得到授权再次保证，美国完全恪守它不仅同台湾，而且同太平洋及其他缔约国家的条约关系，请放心！”

布什见周书楷仍不放心，又进一步解释说：“美国已和日本商量好‘重要事项’案，把驱逐你们也作为‘重要事项’处理，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通过。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况且，北京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这一修正案得以成立，北京会拒绝参加联合国，结果仍会达到阻挠恢复北京席位之目的。你放心好了，保证不会出问题！”

但是，通过80个会员国一周的激烈辩论，美国、日本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美国代表在发言中虽然竭力为他们炮制的两项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进行鼓吹和解释，但他们的欺骗宣传和荒谬论点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有力揭露和驳斥。

面对这一不利的局势，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奔走，对别国施加压力，并进行拉拢活动。直到10月25日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

面要求推迟表决，“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但是，美、日代表这些手法仍以 53 票赞成，56 票反对，19 票弃权被大会拒绝了。接着，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又以 55 票赞成，59 票反对，15 票弃权被大会否决了。

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对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呼，歌唱。这时“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布什又跳上讲台，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立即驱逐蒋帮代表出联合国一节。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经过大会主席马立克的裁决，布什的这一企图也遭到挫败。眼见大势已去，无法再赖下去，蒋帮的所谓“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并随即领着手下的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接着，提付表决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案，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这时，联大会场上再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据美联社报道，对于美国在联合国遭到的这样一次“最惨重的失败”，美国政府人士“感到吃惊”和“表示极为失望”。布什在表决结束后发表谈话，对于这一表决结果“感到悲伤”。他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我感到极为失望”。但是，连他也不能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是令人不快的，但是

刚刚投票的结果，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20多年来，美国耍尽了种种阴谋诡计，顽固地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结果却落得日益孤立。据美国报纸披露，为了在第26届联大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了信；美国对数十个国家的首都还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罗杰斯和布什在联合国会场内外，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印多次话；美国还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贿赂或露骨的威胁。即使如此，他们的阴谋仍遭到彻底的失败。

1971年10月25日，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对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基辛格来说，也是个“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日子。就在基辛格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同车为他送行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他说：“据估计，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博士，你看今年联大能恢复我国的席位吗？”

“不行，”基辛格十分自信地说，“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见基辛格回答得如此肯定，就故意眨了眨眼开玩笑地问：“博士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联合国？”

“估计明年吧！”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稍作考虑后说，“等尼克松总统一访华，你们就能进入联合国了。”

“我看不见得吧！”乔冠华按周总理的指示并不点破天机，只是重复地仰脸大笑道，“我看不见得，现在人心所向正在发生变化！”

基辛格博士在机场辞别乔冠华，心满意足地乘飞机腾空而起，当他正在欣赏京郊美丽的秋色时，忽然电讯员送来电报：“联大刚才以76票对35票，以压倒多数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的决议。”基辛格看后傻眼了。坐在他旁边的洛德说：“要是换了赫鲁晓夫，我们就难逃一场讽刺挖苦了！”

“美国失败了。”基辛格在飞机上陷入了沉思，“从而结束了一场进行得最为紧张的游说努力。”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我国政府曾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却根本没有付诸表决就流产了。问题的实质在于，友好国家改变了立场。它们当中很多国家长期以来感到苦恼，一方面它们不愿同我们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它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我们的某种惩罚。现在我们戏剧化地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这种惩罚了。因此，国务院要制定一项‘合理妥协’方案的全部努力都毫无用处。其他国家投票接纳北京不仅符合它们地缘政治的利益，而且支持北京还是讨好国内左派的一个办法，如果看起来像是在蔑视美国，那就更加有效了。”

中国在联合国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的确使日夜操劳的中南海的领袖们非常高兴。毛泽东以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那根指挥棒，还是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联大恢复中国席位的斗争中，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件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说，“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他们。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张，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张。这是和我们长期致力于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分不开的。表决结果一宣布，他们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总理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当然，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罢了！”

为了研究派代表出席26届联大问题，在恢复中国席位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约请周恩来，叶剑英和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等人到中南海他的住处议事。毛泽东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指乔冠华）当团长、熊向晖当代

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访问）。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说：“就让黄华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毛泽东说：“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

“你们这次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毛泽东说，“要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接着，毛泽东谈了这篇发言包括的内容。他说：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家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时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

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对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毛泽东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4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在准备工作一切基本就绪之后，就在我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又约见代表团团长和部分代

表及有关成员。这天晚上，毛泽东兴致极高，毫无倦意。他手拿着小雪茄，纵谈世界，从欧安会谈到中美关系，直至联合国的斗争，引经据典，以古喻今，谈笑风生。他说：“今年我们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穷朋友帮我们打的，是广大亚非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多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不同。”毛泽东说，“根本的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是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最后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工作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指林彪）。你们要大胆工作，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见机行事，不要怕说错误，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要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11月15日上午，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当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副团长黄华步入会场时，座无虚席的整个大厅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各国代表纷纷前来向中国代表团表

示由衷的祝贺和欢迎。在大会主席马立克首先致欢迎词后，接着由 57 个国家的代表争先恐后地一个接一个上台发言，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里，如此众多的人出席会议是空前的；如此众多的国家代表为一国代表团致欢迎词，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会议整整历时 6 个小时，仍有不少国家代表要求发言。这生动地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在各国代表团致欢迎词后，乔冠华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身份走上联合国的讲台。他的风度和气质立刻引起全场人员的强烈关注。他首先对大会主席和代表们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所有国家，对以不同方式对我国表示了同情的其他国家表示衷心感谢。

接着，他全面阐述了我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特别当讲到裁军、中东问题和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时，有力地抨击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严厉地谴责美国、日本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无限向往。

乔冠华的讲话震动了联合国大会，博得各国代表的衷心赞扬，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当他讲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时，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都欣慰地投以赞赏的目光”；

当讲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非洲国家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当讲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 200 海里领海权时，拉美国家的代表抑制不住兴奋之情，有的代表激动得竟从座位上跳起来。

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几乎是与会国家（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外）普遍关心的问题，当乔冠华讲到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应该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时，会场上又一次爆发出长达两分钟之久的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到中国代表座席前同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各位代表亲切握手，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欢迎。阿尔及利亚代表说：“我们所期待、所需要的正是一篇这样的发言。”毛里塔尼亚代表说：“你们的讲话既保持了我国一向谦虚的态度，又坚持了正确的立场，特别重要的是中国重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人民中国在联大出现，对第三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据新华社记者现场观察，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讲话成了美国新闻媒体和世界各大通讯社争先报道的重大新闻。美国最有影响的《纽约时报》以显要位置刊登了乔冠华的讲话全文。美国其他报刊也纷纷以摘要或全文形式迅速予以刊登。美国三大电视网在会后立即播放的报道中称：“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之后的首次发言，犹如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

中国重新进入联合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联大恢复中国席位两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首次访问。经过会谈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从此，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世界紧张局势开始按照绝大多数人们的愿望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因此，尼克松声称“这一周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这次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之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撼动世界。”

尼克松访华之后，全世界进一步掀起了“中国热”。西方发达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势头更加迅猛。1972年3月13日，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半个月之后，英国政府终于放弃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且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同时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机构。中英两国政府由此达成了正式建交的协议，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同年5月18日，荷兰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的抉择。6月15日，希腊也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也随之高涨。1972年5月，联邦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并很快获得中国方面的邀请。经过40天的谈判，中德两国达成建交协议。

在这之后，欧洲卢森堡、西班牙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数月间，共有

二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每一个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于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台，台北“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世界局势的变化，对台湾如同大地震，他们惊呼：“世界变了！”

在东方，在亚洲，受冲击最大的是日本。20多年来，日本政府不顾日本人民的强烈要求，奉行僵硬的对华政策，对美国亦步亦趋，到头来却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率先与中国改善关系，并举行了最高级会晤。美国的这种做法，不能不使日本政府有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日本政界的有识之士以此为契机，再一次强烈要求日本当局迅速开展自主和平外交，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原来奉行的对华政策再也难以为继了。1972年7月，在中国问题上一筹莫展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被迫下台。田中角荣上台后，顺应人民的要求和时代的发展，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决定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

面对联大恢复中国席位后，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毛泽东仍告诫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就在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4年之后，1976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连串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

悲尽欢来看龙年

难忘一九七六年，
元勋三失泪未干；
天安门悲唐山震，
妖孽被捉举国欢。

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翻天覆地的年代。在这一年，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连串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因此，有人说，1976年对中国既是大悲之年，又是大喜之年。就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了；唐山发生了损失惨重的7.8级大地震；然而，也就在这一年的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为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带来了新的转机。

1976年元旦，天寒地冻，满目冰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局面。就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1月8日，中国人民的擎天巨柱，外交战线上的主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周恩来的逝世，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引起了巨大悲痛。千山肃穆、万水呜咽、亿万人民在呼唤：“我们的好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

的心中！”

周恩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首都百万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亘古未有的悲壮场面，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重重叠叠的花圈，凝聚着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寄托着无限深切的哀思。

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江青集团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都人民自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松柏枝头花如雪，白玉栏杆泪万行”的天安门广场就成了花山诗海。人民已经高举起铁拳头，愤怒地向祸国殃民的奸雄们声讨。一首诗中写道：

昔日悼总理，
悲痛若断肠。
今朝想总理，
浑身是力量。
豺狼何所惧，
虎豹咱敢降。
识别假马列，
怒斥妖婆娘。

人民，在这里再次执行自己神圣的权力和意志。4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有一首传抄最广的诗贴在纪念碑前：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人民发出了战斗的誓言：

热血汇成连天浪，
红心再造找中华！

4月2日上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最高一层飞檐上出现了四块巨大的诗牌。人们只要一走进天安门广场，诗牌便赫然在目：

红心已结胜利果，
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
自有擒妖打鬼人。

在天安门广场上醒目地贴着这样的誓词：“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刺刀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也把头颅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等到胜利的那二天，我们再来纪念碑前，用敌人的头来祭你。”在天安门广场大量的诗词中，“擒妖魔”、“斩鬼怪”、“剑出鞘”，表达了人民战斗的决心。一些挽联这样写道：

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
革命者鞠躬尽瘁虽死犹生！

总理回眸应笑慰，
斩妖自有后来人。

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不光有首都各阶层的群众，还有全国各地的人们，大家素不相识，心却是相通的。一首《献给总理的歌》写道：

涉过水几道，
翻过山几重，

中华好儿女，
清明时节聚北京。
采来鲜花束束，
摘取松柏青青，
带来四面八方的悼念，
捎来天南地北的心声。

有一首署名孙元亮的南京作者，在《满江红——悼念周恩来总理》词中，感人肺腑地表达了广大群众对总理的深情悼念。词中写道：

星殒东方，
天地咽，山河减色。
忍为民，赴汤蹈火。
心血沥绝。
开天辟地奠国基，
踪迹环球创伟业。
问六十春秋昼与夜，
可曾歇？

瞻遗容，泪不绝；
哭总理，肝肠裂。
化举国之哀，
坚持马列。
岂忍江山付东流，

那堪神州再溶雪。
将遗愿早日化宏图，
此心切。

4月3日，是清明节的前一天，天下着蒙蒙细雨。可是一大早成千上万的人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根本不把“四人帮”的禁令放在眼里。有些工厂、机关、单位列队前来，浩浩荡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到了4月4日（丙辰年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联络员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4月5日清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时30分，一万多民兵、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酿成流血事件。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已经准备好的两个以中共中央名义签署的决议。第一个决议

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两个决议在政治局通过一小时后，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是一次革命性行动。已经持续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1966年—1976年，十年的风风雨雨，把“文化大革命”的神圣光环销蚀殆尽，美好的空洞理想代替不了凄苦的生活现实，种种“伟大”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人们心中的激情。绝大多数人已经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一场灾难，而不再对它抱任何幻想。相反地，种种怨怼、不满和愤慨都已越积越多。

广大人民群众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不满，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这个抗议运动、实质上代表了人民群众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天安门的“四五”

运动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地下的革命烈火仍在燃烧！

1976年7月6日，周总理逝世还不到半年，另一个噩耗在神州大地降临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元帅与世长辞了。周恩来的逝世使朱德痛苦万分，身体更加不如从前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经常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直呆呆地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苍穹，任凭脸颊上的热泪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呀，恩来你在哪里……”

在54年的并肩战斗生活里，朱德和周恩来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战斗友谊，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把这两颗伟大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在德国柏林会面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50多年来，他们在一起挑起了历史重担，一同经历风雨的磨难。在艰难险阻中，他们患难与共，在惊涛骇浪里他们同舟共济。他们像手足一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更何况此时“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国际形势由于超级大国的侵略和争夺更加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这个擎天柱离世而去，这怎能不使这位与之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悲痛欲绝呢？

7月1日那天，朱德老人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除肺炎外，又增加了肠炎和肾病，而且高烧一直不退。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一位中央负责人说：“你要抓经济，我们的国际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一定要搞上去，这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啊……”然而，到了1976年的7月6日下午3时，朱德元帅就与世长辞了。几十年来，他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兴旺发达，风里雨里、没日没夜的冲啊、杀啊，忙个不停，为革命奋斗了终生，为国为民耗尽了毕生的心血。他的去世又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然而，祸不单行。在朱德委员长逝世 20 多天后，冀东工业重镇唐山，又于 1976 年 7 月 28 日发生了震级为 7.8 级，烈度为 11 度的强震。唐山地震是迄今为止 400 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书，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数字：死亡 242769 人，重伤 164851 人。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 2.4 倍，智利大地震的 35 倍，阿拉斯加大地震的 1300 多倍！

当时，全世界的地震台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力。虽然没有得到关于震中的确切情报，可是所有的地震学家都能感觉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全世界的各大通讯社当日便公布了各地震台的记录。

美国全国地震情报中心报告：中国北京东南 100 英里处发生强烈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所报告：

北京东南约 100 英里，北纬 39.6°、东经 118.1°，在天津附近，发生 8.2 级地震。

日本气象厅报告：

中国发生 7.5 级至 8.2 级之间的地震，震中在北纬 43°、东经 115°地区。

香港的英国皇家天文台宣布：

中国发生的地震为 8 级左右，震中：东经 118.1°、北纬 39.6°，距唐山极近。

中国台北“中央气象局”报告：

大陆北部的强烈地震，规模为 8 级，震中在北京东部 135 公里附近……

一道道电波，接连不断地穿越太空。然而，当时谁也想象不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惨景；中国唐山，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已经在地球局部的震动中夷为平地！

中国新华通讯社于 7 月 28 日向全世界发布了如下的消息：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 月 28 日 3 时 42 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强烈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 7.5 级。”

几天后，新华社再次公布经过核定的地震级为 MS7.8 级。

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和国务院煤炭工业部部长萧寒奉命立即乘飞机赶往唐山。接着党中央紧急调动各方力量，组织人力、物力火速奔赴唐山进行抢救。7月28日当天，通往唐山的一条公路上，烟尘弥漫，马达轰鸣，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万救灾部队，日夜兼程向地震灾区开进。摇晃着鞭状天线的电台车，不时向部队发出联络信号；飘扬着红十字旗的卫生车上，各医疗队正紧急部署抢救工作；无数辆满载士兵的解放牌卡车，此起彼伏鸣响喇叭，在凸凹不平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条长龙。一支支救灾队伍，正以最快的速度向被摧毁的城市开进。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医疗队，10000多名医务人员，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展开抢救工作。在地震伤员中，各类骨折伤占伤员总数的58%，截瘫占9.1%，软组织损伤占12.9%，挤压综合症占2.1%，其他伤情占17.9%。几乎每5个幸存的唐山人中就有一个重伤员，这是一个16万多人的巨大数字！

为了使伤员能得到及时的治疗，7月30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命令下达后，大批飞机和列车被紧急调往灾区，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内的伤员大转移。

截至8月25日，共计159列（次）火车，470架

(次)飞机，将 100263 名伤员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和上海。

自 7 月 28 日到 8 月 12 日的半月间，唐山机场起落各类运送伤员和物资的飞机共 2885 架次，最多的日子一天 354 架次，平均两分钟起降一次，密度最大时，间隔仅 26 秒。机种繁多，时速各异，又有如此大的起降密度，这对于一个受到地震破坏的中等规模的军用机场来说，可以说是奇迹。

正当全国人民积极支援唐山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却于 1976 年 9 月 9 日与世长辞了。可以想见，在 70 年代中期沉浮在“红海洋”之中的中国，突然间失去这一位“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会带来多么大的政治震撼。习惯于“毛泽东挥手我前进”的人们，似乎失去了方向，不知怎样生活下去。“毛主席啊！没有你老人家，中国怎么办啊？……”许多人失声痛哭，反复呼喊着这样的话。9 月 18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隆重的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表示要“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的晚年虽然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江泽民主席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绩，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江泽民指出，“他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也坚决地批评了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说：“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已经存在的深刻政治危机更加严重。广大干部群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深感忧虑，这种忧虑是有根据的。“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伪造了一个

“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并公开提出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为此诬蔑和打击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华国锋、叶剑英等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痼疾，才能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经过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决定先发制人、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逮捕了“四人帮”，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此，党和人民在经历了10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干部和党员中，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真是人心大快。老诗人赵朴初在《快刀斩麻除四害》诗中这样写道：

王八乌龟梦发财，
洪水江波起上海。
文面鼠辈大流氓，
绞尽脑汁想上台。

大江南北齐愤慨，
快刀斩麻除四害。
人民欢呼新胜利，
心花怒放乐开怀。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同时，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全会认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四人帮”的覆灭 与邓小平的复出

第二次复出，邓小平得益于 他是中央苏区的“毛派的头子”

1969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林彪以战略疏散的名义发配到江西南昌市郊一个偏僻的角落，从此开始了他三年零四个月的“牛棚”生活。这是他第二次被打倒。

三年零四个月对一位65岁的老人来说是够长的，更何况他当初并不知道自己重获解放的确切时日。从15岁旅法求学算起，整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世纪。如今远离政治中心，谪居江南一隅，他该如何打发这段没有“刑期”的流放生活呢？

据他的小女毛毛（邓榕）说：“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

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我时常看看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毛毛还反映她父亲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自己的园子里养鸡种菜，晚上读书看报，冬天还坚持每天用冷水擦身。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被打倒在地而心灰意冷、自甘消沉。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怪胎的彻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8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此后一连几天，邓小平依然是少言寡语，他在紧张而激烈地思考。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历史已经遇到了一个新的转机；而在这个转折中，无疑将对自己的政治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于是，他毅然挥笔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四千余字的长信，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他向毛揭露了他所知道的林彪、陈伯达的反革

命罪行。

第二，他非常谦虚地向毛检查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第三，他向毛表达了自己想为祖国为人民继续工作的强烈愿望。

当这封信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时，他被这位老朋友那熟悉的字迹打动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眼前浮现。林彪的死，毛泽东意识到他是想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邓小平也是他打击的首要对象之一。

偏偏，陈毅元帅于1972年1月6日去世，毛泽东感叹万千。非常破例地穿着睡袍抱病参加陈的追悼会引起党内外极大的关注。追悼会上毛讲了许多陈的好话，仿佛他现在才发现陈毅是个好人。其实陈毅反对过他多次。不过陈所谓“反对毛主席”有个特点，即都是公开的，不像林彪搞阴谋诡计。陈的坦率直言与林的两面三刀在毛面前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照自然会延伸到邓小平身上，因为邓和陈一样，也是有名的直性子。

追悼会上，毛泽东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了陈毅的一生，同时还看似无意有意地同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说明毛泽东准备起用邓小平，先给大家“下些毛毛雨”。在场的周恩来心领神会，暗示陈毅的家属们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解决。

同邓小平一起在江西“接受改造”的王震已于邓先期回京。当他听说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谈到了邓小平，

有了转弯的预兆，便利用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向主席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极力建议毛泽东尽快启用邓小平。王震摸到毛泽东的底儿后，立即派人找到回京的邓榕，要她回江西后转告她的爸爸，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如何把刘与邓区别开来的办法。

8月3日，远在江西的邓小平得到这个消息后，又不失时机地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邓小平检讨了过去，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也解释了一些问题。邓小平再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工作。此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很快转给了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不管怎么说，有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就好办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批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启用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里的文革派，即后来的“四人帮”，非常害怕邓小平复出。他

们对付一个周恩来已属不易，再来一个邓小平就更加不利，而且他们知道邓小平是更难以对付的。但是，由于周恩来手上握着毛泽东的上方宝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好暂退一步，同意邓小平复出。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5个月后邓进入中央委员会。邓迈出了复出的第一步，这一步非常艰难，但不是决定性的。

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2月20日，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放逐生活，邓小平乘火车由赣回京，迎接与毛泽东的再一次伟大而困难的合作。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例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大致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

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一位外国记者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球，他也成为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

复出后的两年中， 邓小平多次挫败“四人帮”

对邓小平来说，迈出第一步是艰难的，但随后与“四人帮”的斗争更是困难重要。在这两年多的较量中，显示出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气魄，《邓小平谋略》中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记载：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大书房里召集了一次对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很有意义的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紧接着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是靠这首歌带出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党的，林彪事件后他不止一次号召他的下属齐唱这首歌。看得出他很想把全党全军的步调重新统一起来，解决好林彪死后留下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现象。毛泽东早在这年年初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再次重申表明他觉得问题到一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怎么解决呢？毛泽东把视线移向坐在一旁的邓小平，“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毛像介绍特别来宾似的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接着对邓进行公开评价：“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希望邓把“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毛泽东当众建议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还准备给邓配个政治局秘书长。邓不要这个头衔，毛就让他当军委参谋长。毛心想有邓小平的果断和魄力，不议政，不议军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主要因为邓人才难得，办事果断。现在，他就需要这样的人才，以便填补周恩来以后的权力真空。这种发展趋势引起“四人帮”极大的恐慌。首先出面反对重用邓小平的是江青。1974年3月政治局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第6届特别会议。毛泽东记得60年代邓小平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较量的劲头，便提议邓去。江青害怕邓小平的国际舞台上再次提高威望，极力加以反对，毛泽东没有偏袒他的夫人，反而严厉警告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意见。邓小平复出后与“四人帮”的第一次较量，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而取得胜利。

“四人帮”排挤邓小平，是因为邓和周恩来联在一起。周到1974年身体越来越糟。如果邓一步步上升，将来周的接班人就非他莫属了。这是“四人帮”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他们几人都知道邓比周硬，因而更难对付，因此必须趁他羽翼未丰时加紧打击。1974年7月，毛主持又一次政治局会议。“四人帮”趁周不在场，由江青带头，其他三

人配合，从不同方面向周恩来发起攻击，想通过攻周达到排邓的目的。毛泽东大为恼火，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要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即不要乱打棍子（设钢铁工厂），乱扣帽子（设帽子工厂）。江青等人不自量力，把看家本领用到周恩来身上，结果更引起毛泽东的反感。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和“四人小宗派”的概念，使江青等人在以后的较量更加被动。

毛泽东的性格是他认准了的事，别人越反对他越坚决。“四人帮”攻周排邓是冲着周以后国务院总理的位子而来的。毛反其道而行之，于1974年10月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周以后的总理人选预作了安排。这下“四人帮”更慌了手脚。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如果人大后形成一个周、邓体制，他们的梦想就全部落空。无论如何，他们要阻止这一局面出现。这一次，他们经过预谋，决定拿“风庆轮问题”对邓搞一场突然袭击。10月17日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江青首先发难，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上的崇洋卖国问题，并且逼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邓面临两难选择：他不会同意江青的说法，但是如果起而反驳势必爆发一场无谓的主义之争，争论中很可能被他们抓住什么辫子，因为这帮人不依不饶，大吵大闹。邓气极：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你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待人。“四人帮”一拥而上：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忍无可忍，以便干脆的方式回答了“四人帮”的挑衅，他起身离席，拂袖而去。毛泽东后来称赞邓这一次不向“四人帮”让步，做得好。

“四人帮”这次突然袭击不仅没有捡到便宜，反而有可能要负搅乱政治局会议的责任。因此他们更加紧张起来。为了争取主动，他们决定恶人先告状，兵分两路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路由毛泽东亲手提拔的接班人王洪文出面，到长沙面见毛泽东，从正面告周恩来等人的状。另一路江青亲自出马，去找很受毛泽东信任的两名年轻翻译——王海蓉和唐闻生，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从侧面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如何大闹政治局会议，性质类同“二月逆流”，以及周恩来在医院里如何借工作为名经常和少数几个人搞串连等情况。首先使他们失算的是王、唐二人很快就把他们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邓等人行得正、站得稳，并不急于向毛泽东表白什么。结果事情的发展又出乎“四人帮”的意料，他们的两路夹攻不仅没有争到主动，反而更加被动。

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说，周恩来住在医院里并不全是养病，而是每天找人谈到深夜，经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样频繁的往来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还特别提醒毛泽东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为他知道政治局内有两个阵线，他不能偏听一个方面，还需要兼听。第三天王海蓉和唐闻生来长沙向毛反映了事情的真相，毛心里有了底，要王、唐回京后转达他的指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在四届人大前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12月下旬周恩来和王洪文一同来长沙见毛泽东，毛当着王洪文的面再次警告不要搞“四人帮”，并直言不讳地说邓的政治思想比王强。接着毛一字一句地设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周恩来本打算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给他了更高的位置，要邓当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理由是邓人才难得。邓在11月中旬也来过一次长沙，当时他向毛表示，安排他做这三件工作，他没有意见，但是他觉得责任太重了一点，怕负不起。毛泽东鼓励他把担子挑起来。这三副“担子”“四人帮”伸手抢了好久，毛泽东就是不给。邓觉得责任重大，毛反而鼓励他干。这至少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主动和被动存在某种辩证转化关系：太主动了反而被动，适当的被动反而主动。

邓小平复出后两年中多次同“四人帮”交锋，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邓占上风，“四人帮”越来越被动。1975年夏天毛泽东甚至让邓小平主持过两次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迫使江青和王洪文公开检讨认错。邓能取得如此成功，除了有周恩来等元老的支持，“四人帮”的不得人心，邓本人的才能令毛泽东赏识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邓掌握了同毛泽东相处的方法。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无非因为他觉得大权旁落，有人不听他的话，搞了一条他不同意的路线。邓小平复出后，像毛所希望的那样，把过去的缺点改了一改，遇事都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当然是不卑不亢的，既尊重，又有个性，坦荡

无私。毛泽东最反感的是别人背着他拉帮结派搞小集团，林彪垮台后他总结经验教训反复强调要“三要三不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毛泽东心门中，“四人帮”的马列主义也许不差，但后两条就存在嫌疑，所以他多次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邓小平的最大特点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毛泽东经过林彪的教训后对这一点特别欣赏。而有了这一条，团结自然不成问题。在中共党内帮派厉绝对禁止的东西，但“帮”和“派”的概念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关键看你搞阴谋还是搞“阳谋”，所谓“阳谋”就是对最高权威公开。这种公开化意味着同最高权威站在一派，而这种“派”是合法的即不算帮派，不存在分裂党的问题。要说邓也是有倾向性的，对江青那一派来说，邓这边也有一派，即邓、周、叶、李等人。但是邓和周不像江青那样把少数几个人固定地搞在一起。这边即使有个“派”也没有严格的界限，因而可以容纳大多数，因而也就谈不上帮派。再加上邓事事向毛公开，紧紧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站在毛这一“派”上，这样对付“四人帮”就有很大的优势。

在邓小平与“四人帮”的这一段斗争中，毛泽东确实处处为邓撑了腰。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后来邓在评价毛泽东时坚持要把毛晚年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罪行明确分开。邓在全面否定毛的文革时，仍称毛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江青在他眼中，则只有“零分以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多次批评“四人帮”的行径，甚至还说过“今年不

解决明年解决”的话，但他生前始终没有予以解决。这除了他认为“四人帮”在批刘、批林中有功之外，是否还觉得“四人帮”这张牌在某些时期还是有用的呢？后来邓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还是立了大功的。

宁可再次被打倒， 也不愿为文化大革命树碑立传

“抓革命，促生产”，是1975年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两大主题。对于后者，正如毛毛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

“父亲被打倒过一次了，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存有丝毫的犹豫。”

“他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沉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他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月17日，四届人大在北京结束，在新当选的国务院领导人中，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

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当选为副总理，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从而完全挫败了“四人帮”妄图在四届人大实行他们“组阁”的阴谋。

但在这个副总理的名单之中，紧随邓小平之后的第二副总理张春桥。

现在看来，毛泽东在 1975 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他认为“反刘反林有功”的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七个指头”的成果，而江青这些人也，确实只会“革”别人的“命”，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则是一窍不通的；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去“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而这些老同志也只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毛泽东总是提防着他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种“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双轨制”，反映了当时毛泽东面临的局势和他的心态。他一方面感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生产下降，人民不满，再也不能乱下去了，希望尽快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希望证明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其主流只能肯定不容否定。如果说他老人家还像当年那样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能够亲自驾驭局面，情况或许能暂时如愿。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八十二岁高龄，体力精力都大不如前了。

自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年年重病，大有一蹶不振之势，况且此时他眼已失明，不能行走，连言语表达都很困难。老人家头脑，虽然还算清楚，但已很难直接驾

驳局势了。他苦于找不到能够完成上述两方面愿望的统一的一种力量，只得既靠邓小平去促生产，去稳定局面，且不允许江青一伙过多地干扰；又要依靠江青等人去实现保住“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愿望，且不允许邓小平的“整顿”踩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线。总之，毛泽东陷入了矛盾之中：他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他体力与愿望的矛盾，他依靠力量之间的矛盾，等等。

这些复杂的矛盾，造成了1975年形势发展的离奇性。

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搞所谓的“理论学习”、“评《水浒》”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1975年9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毛远新说：今年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一）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

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

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挑唆性的话打中了痛处，使他立即警觉起来。当然，从总体事实而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否定。于是，毛泽东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站在江青一面反对邓小平。

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

1. 打倒一切；
2. 全面内战。

“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

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堵江青等人的口。

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拒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告状事件又加罪邓小平。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和党委的其他几位同

志，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呈毛主席的。迟群和谢静宜都曾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驻清华大学，并“结合”到校“革委会”领导班子里。他们自认是毛主席身边的“小兵”，跋扈专横，目空一切。他们和江青一伙相勾结，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教职工们对之极为反感。作为老干部的刘冰，实在看不下去，按照党的章程，向毛主席反映意见，这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毛泽东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小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领导的持续九个月卓有成效的整顿，到此中止了。

民心不可欺：“总理遗言” 竟成“头号反革命事件”

1976年，中国进入了“本命年”龙年，就像那一年发生的强烈地震的一年，1976年也是中国政治巨人陨落一样，七亿人民在沉痛和期待中度过了1976年。

1月8日，人民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毛泽东重病在身，终于未能和这位一生与他共患难的挚友作最后的告别。当护卫人员问他是否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时，他痛苦而吃力地摇了摇头，“我也走不动了。”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极力反对邓出面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或张春桥作悼词，但王、张都自知不够格，于是让叶剑英出面，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回答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作悼词。”“四人帮”无奈只好同意。毛泽东最后“划圈”批准了这个安排。当全国老百姓从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介中得知是邓小平为周总理致悼词时，心情稍微得以舒展。因为人民怕“四人帮”这些奸臣玷污了周总理的英名，也怕邓小平“消失”。

悲痛欲绝的人民群众，在严寒而灰暗的天空下，站在几十里长安大街默默地送走周恩来的灵车，向他们心目中的好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山山肃立，万木齐哀，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海洋之中，向这位享有“七亿人民总管家”美誉的好总理送行。

不久，一位名叫李君旭的青年写下了轰动海内外的《周恩来总理遗言》，当时，他只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年仅23岁，却在一腔热血的鼓舞下，博览总理生平资料 and 大量党史、军史之后，喊出了七亿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遗言”中这样写道：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他们的地位

是举足轻重的。我们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良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示：

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三、骨灰不保存，撒掉。

《遗言》一问世，全国各地很快便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手抄本，而且 130 多个国家的电台、通讯社争先播发了它。

“总理遗言”为不久后的“四·五”运动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它是向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战的檄文，在十年“文革”史上，《遗言》有它特殊的地位。

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遗言》作为“头号反革命事件”受到追查。5月5日，4名公安人员带走了正在工作的李君旭，被投入北京的监狱，单独监禁长达 18 个月，直到 1977 年 11 月才获得自由。

与此同时，在上海、南京爆发了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南京的示威群众呼出厂“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的口号。

南方的风暴很快扩展到了北京，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清明节前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一九七六年五四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的改革是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人，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很恶毒的”，“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会议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调动民兵和公安人员进行镇压，抓“反革命”。4月5日，四人帮出动数万人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决定继续进行追击追查。江青一伙利用《人民日报》大肆制造舆论，制造白色恐怖，猖狂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当面攻击邓小平是“纳吉”，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1956年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青、毛远新到毛主席处报告情况，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决议指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了。

“四人帮”的覆灭

1976年，是中国政治巨星相继陨落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的龙年，春、夏两季，中国大地上的吉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和伟人们一起进入了历史。

继1月8日周总理辞世之后，7月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总司令也与世长辞。

此时的邓小平撤职闲居在家，又过起类似在江西被软禁的生活。在北京东城区宽街的邓小平居处，上边还派了一个加强班负责警卫。不准外出的邓小平又像在江西时那样，在这个古老的宅院里周而复始地散起步来，只是脚步沉重了许多。“四人帮”猖獗一时，毛泽东身怀重病并被“四人帮”架空，国家和人民深陷灾难之中，事事都使这位七十二岁的政治家的心情更为沉重。

然而再次中箭落马的邓小平还是看不出有什么消沉、绝望的表现。像在江西的“牛棚”中一样，他仍旧在庭院里一圈一圈地散步，仍旧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仍旧坚持用冷水沐身，尽管此时的他已经72岁了。当年的警卫人员向人们回忆邓散步时的样子：“当那步子陡然一缓，小平同志的头便慢慢、慢慢地仰起来。他开始深呼吸，两眼恢复了沉静，目光又是那种我所熟悉的样子：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里藏着犀利。”邓的沉着自信来自两点：

一是人民的拥护，这一点“四五”运动可以印证；

二是朝中元老的支持。

周恩来去世后不久，邓和叶剑英元帅曾交过一次心。那时邓就作了被打倒的准备，但是他相信。只要有老帅们在，有其他老同志在，他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叫剑英表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9月9日，毛泽东，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撒手与世长辞了。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在他合上眼睛离开他缔造的党和国家，离开热爱他养育他的人民的时候，是既不安详也不平静的。老人家在重病，断断续续地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戎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年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既不信任邓小平，又不相信野心勃勃而四面树敌的“四人帮”，于是，这位83岁的老人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英明决策；把权力交给不属于任

何一派的华国锋。毛希望华能起到平衡、中和作用，同时为两种力量所接受。

没有将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一伙，可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希望能参加主席追悼会的要求被无理驳回。后来，他让家人采来松枝，做成花圈，在家中设立了一个灵堂，带领全家一起，在毛泽东的遗像前深深地默哀。

毛泽东刚病逝，江青在黎明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毛的丧事安排并不关心，而急于马上将邓小平开除党。从而早日实现她的“女皇梦”。“四人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坚持他们继承毛泽东思想的权利；控制党中央；准备武装对抗。

姚文元通过新闻界大造舆论，坚持要深入地批邓、防止右倾翻案风；王洪文在中南海设立自己的值班室，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委下达指示，要求凡是重大问题都要与他商量，以维持他们对省级机构的控制；同时，上海十万民兵都发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

而华国锋的有利条件是他位居第一副主席，并且有毛写给他的三句话保证其继承地位的合法性。这三句话是：“莫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看出这三条最高指示的含糊性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他另外杜撰了一条毛主席的临终嘱

咐：“按既定方针办”，背着华大加宣传。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就含义说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六个字中有三个字不同。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马上就会产生疑问：毛主席的遗嘱冒出两条来，谁知道哪条是真的呢？舆论控制民意的特点是先入为主。如果华国锋试图纠正这三个字，反而可能被认为想篡改最高指示。这时到底谁真谁假又取决于谁掌握了舆论。更重要的是，人们只知道毛主席嘱咐他们要按既定方针办，但既定方针到底是什么呢？毛主席没说。这就意味着“四人帮”想说什么，什么就是毛主席的临终遗嘱。这些都说明华的地位正在受到“四人帮”的威胁。

华国锋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叶剑英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传话——如果华能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他老同志将支持他。华国锋得到叶帅的支持后，才意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了。

10月2日，毛远新命令沈阳部队的一个装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帅立即命令该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紧随着江青、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了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终导致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由于“四人帮”让其追随者们10月9日“听好消息”，人们普遍担心他们正在策划某种行动。颇为吃惊的叶剑英急忙隐蔽了起来。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部所在地西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未叫“四人帮”参加），会上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汪东兴和人民解放军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团）负责具体执行。

10月6日，华国锋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校订和“研究”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议案。王、张作为政治局常委理当出席。他俩于上午8时来到中南海的怀仁堂。而姚文元则以他是全国头号宣传家，如果毛选出版前作最后修改或修饰，显然需要他去执行，以此为借口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于是，汪东兴命令警卫将他们押走，与此同时，江青和毛远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

不久，“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也相继被解决，文化革命宣告结束。

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过渡时期的政治人物

应该说，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是有功的，党和人民对他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邓小平听到消息后，他的高兴心情一点也不亚于5年前在江西听到林彪灭

亡的喜讯，10月10日，他热情洋溢地致信华国锋和党中央，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

同时，他在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我衷心拥护中央的决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和军委主席。我为这个决议高兴喝彩，它不但对党而且对社会主义是有重要意义。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讲国锋同志都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他的年龄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将稳定15年或者20年。对党和对人民的确是一项英明的决策！这难道不是大家高兴的事？”

邓小平的这封信使朝野要求邓复出的势力有了根据。但是华国锋对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反应很冷淡。在他看来，粉碎“四人帮”是他华主席的胜利，而不是邓小平胜利。

“四人帮”的罪行并不能抵销邓小平的错误。当然，两个冤家对头现都打倒了，问题有点复杂化。10月26日华在听取宣传上的汇报后提出四点意见，初步表达了他处理邓小平、“四人帮”和毛主席三者关系的思路：

1. 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2. “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3. 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4. 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

在12月份的会议上，华进一步强调了批邓的必要性。

1977年2月9日，华国锋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

循。”按照这一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难以纠正，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就难以解放出来，历史冤案、假案、错案就难以昭雪。这个方针理所当然地遭到抵制和反对。直到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还继续强调“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陈云、王震等再次要求让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又遭到了压制。

与“两个凡是”斗争最为坚决，并率先从理论上进行批判的还是邓小平，4月10日，他又主动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央转发了邓的信，邓小平问题成为全党关注的焦点。现在再阻止邓小平复出就会成为被孤立的少数，华国锋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同邓接触。

几天以后，他派汪东兴和李鑫去看邓小平，邓开始主动反击。他首先把目标对准华汪等人的护身法宝“两个凡是”，使用的武器则是华国锋自己说过的两句话。邓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想不到的是，几天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迫说出的妥协性讲话竟然与他抱住不放的“两个凡是”自相矛盾。现在他只有采取守势，并且手上只剩下天安门事件一张牌了。他派人与邓小平讲条件，即只要邓作出检讨，

承认错误，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那么就可以让邓出来工作。华心想有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这个枷锁，邓出来后就不是那么可怕了。然而邓的回答是：“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之所以被打倒就是因为天安门事件，现在他置自己的命运不顾而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广大民众仗义执言，这就更增加了他的支持率。华则因为丢失了最后一块阵地，除了让邓五条件复职外，再没有其他选择。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5个月前失去的所有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参谋长。

邓小平在1978年复出工作后曾接见过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这次复出后又和这位总理进行了饶有意思的交谈。他说：“您记得我们1975年的谈话，此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施说：“可是您又回来了。这是您的福，也是中国的福。”施问他：“你究竟被打倒了多少次？”邓微笑着说：“那时是第三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

七十三岁的邓小平，终于在他第三次被“打倒”之后又第三次站起来了。打倒了，爬起来，再打倒，再爬起来，执著地追求使祖国人民富裕、民主、文明，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行列的伟大目标，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这就是邓小平的性格。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邓小平是一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邓小平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祖国和人民终于又选择了邓小平。

然而，“两个凡是”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民的心中。当鼓吹“两个凡是”的文章在“两报一刊”发表时，主持宣传工作的耿飏同志就说：登这样的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于是，以邓小平、胡耀邦等为首的实践派和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的斗争，成为1978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为拥护邓小平力量的第二次呐喊。

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但文章得以刊登出来却与胡耀邦的支持有极大关系，当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指示两位党校理论工作者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和深化。

1978年5月10日，在胡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了胡福明的这篇长篇论文，11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令华国锋和汪东兴烦恼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刊登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成为点燃如火如荼的全国性大讨论的火花。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邓自己也参加了讨论，当时他再次声称需要“实事求是”。邓机敏地运用毛泽东著作中的引文，证明这个原则并不意味着反对毛，恰恰相反，它要恢复主席本人最优秀的传统和实践。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中共党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后来曾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按原定议程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但是陈云再次带头，很快把会议转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全面辩论。他要求公正地恢复薄一波的名誉；为已经于1966年底倒台的陶铸恢复名誉；为于1959年被免职并在60年代后期受到公开批判的彭德怀恢复名誉，以及应当承认康生所犯的严重错误。

陈云发言引起了一片拥护性发言，著名的有谭震林，他要求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事件。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

11月15日，华国锋宣布北京市委重新确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次日，华亲自为首次批准发行的《天安门诗抄》一书题词，对南京和郑州的类似事件也作了重新评价。

12月13日，华国锋被迫在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对“两个凡是”进行检讨。他说：“两个凡是”的提法太绝对了，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汪东兴也作了几句检讨和说明。总之，“凡是派”服输了，实践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五天以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决定了华落邓起。一大批邓的支持者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党的副主席，邓在最高决策圈内多了一个得力盟友。全会还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邓的支持者在党的领导层占了大多数。华、邓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凡是派的多数成员虽然未正式解除党内职务，但他们控制的实权部门已悄悄转手他人。实权最大的汪东兴被免去各项兼职，只剩下一个副主席的空衔。华国锋仍然是党的主席，但却让邓的得力助手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使华的主席有名无实。邓本人并没有晋升职务，他仍然是副主席、副总理，依然排在华的后面。但是邓已经有效地掌握着党内大多数问题的决策权，已经成为事实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从党的主席和政府总理的位置上下来看来已是指日可待的事。可是邓并不急于这么做。他宁可与华保持一种类似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张闻天那样的关系。

这是因为华国锋在政治上还算合作，让他多保留一段时间从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继承下来的头衔，坏处不大，还有好处。在中共党内，什么人都可以随时撤换职务，唯独党的主席是不能随便换的。换主席很容易出现合法性危机，引起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所以邓必须采取逐步过渡的方针，让党内外群众有一个心理上逐渐适应的过程，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又向前推进了一年，凡是派已没有多少阵地可守了。到1980年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时，凡是派的多数成员被撤了职。汪东兴被批准辞去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汪东兴再降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最后一名），其次是北京市长吴德，副总理陈永贵、纪登奎，他们的权力都交给了邓所信任的人。华国锋还是党的主席，不过邓又采取重大步骤，这就是设立中央书记处，让胡耀邦担任总书记。

下一个目标是华的总理职务。1980年8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人事调整，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华的党中央主席职务还保持着，所以说他不再兼任总理是成立的。为了使这一事关重要的总理人事变动显得不是撤华的职，而只是华不再任此兼职，邓小平本人也作出了同样的姿态，他和李先念、陈云三人亦同时被宣布不兼任副总理职务。华和邓同时放弃政府中的职务，而结果是总理的职位转到由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赵紫阳手里。

1980年11月至12月，正是评毛活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尖锐批评华国锋在

粉碎“四人帮”后所犯的原则性错误，还提出华的能力不足以胜任党的主席职务的问题。华的压力增大，被迫提出辞呈。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三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项议程是通过评毛的《历史决议》，另一议程是正式批准华国锋的辞职请求。华默默地放弃了党的主席的空名，但邓小平仍将他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好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一年后，在党的“十二大”上，华又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变成348名中央委员中默默无闻的一名，直到现在，华仍然呆在这个荣誉的位置上，华的时代正式结束。

华在放弃两主席的职务时，曾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党中央主席。邓要这样作，当然谁也不会反对。可邓主动拒绝了这一职务，而把他早已经备好的得力助手胡耀邦提上来担当此任。胡当党的主席，据说在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中是有异议的，邓不得不做大量工作说服政治局成员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接受他的选择。这说明，胡的当选“反映出的是邓小平的合法性而不是邓小平后面的胡耀邦的合法性”。胡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党的主席一年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决定只是设总书记，不再设党的主席，胡耀邦便以总书记的名义出现在党的领袖席位上。

“十二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依次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此次大会同时产生三个中央机构：党的中央委员会，由胡耀邦任总书记；中央顾

问委员会，主任是邓小平；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陈云任第一书记。随后召开的六届人大，叶剑英的委员长让位给彭真，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邓小平任国家军委主席，赵紫阳正式确认为国务院总理。至此，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形成。而军委主席邓小平被公认为“这一代集体领导的核心”。

从此以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伟大时代。

“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但其所以是伟大的转折，决不仅限于此。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倡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争取中国的工业化做了许多努力，得到很大成绩。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破除迷信，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反复出现，使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努力方向受到严重冲击，直到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十年。

在1957年到1966年的曲折前进的期间，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和其他许多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党员，提出过许多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

会主义发展的好的主张、见解和方案，有的已通过实践初步见效，有的并未能比较广泛地付诸实践。但这一切在十年动乱中几乎全部被掩盖掉了。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本应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吸取一切曾经提出过的好思想，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来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能做到这些，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到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被载入党的历史。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紧接着工作会议，12月18日到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华国锋的原来计划，这次全会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这次全会突破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十

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在公报中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这就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次中央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认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

1977年的十一大虽然在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那时还有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任务，而且十一大所继续加以肯定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是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相容的。只有在解放思想、破除“左”倾僵化思想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

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至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是要改变的，但其改变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实际上只是为革命而革命的“左”倾的有害的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三中全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在1979年到1982年间，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扰乱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调整过来，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为了顺利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对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关系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继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党中央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阐述。

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后就再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个理论，按照当时的解释，就是所谓“向走资派夺权”，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今后，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去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台湾及国外的敌对政治相勾结。

在共产党内部，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

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序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在批评怀疑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同时，着重尖锐地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阐明“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197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叶剑英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建国以后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从同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指出，这

个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有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决议》讨论稿写出后，于1980年10月交党内四千人讨论，而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忽视、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以及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使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充分表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以人民的名义审判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总数我们不得而知。在起诉“四人帮”时提到 729511 人，受到“四人帮”及其同伙的蓄意“陷害和迫害”，据称其中三万四千八百余人被迫害致死：河北近 3000 人，云南 1.4 万人，内蒙古 1.6 万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万人。有人估计，1967 年中国约 1.35 亿城市人口中约有 50 万人直接死于文化大革命。

于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历史大审判开始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推上了中国人民的审判台。

1980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3 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庄严宣告：“根据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今天三时许，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起公诉的林彪、江青革命集团案主犯，公开审判！”

随后，江华依照法律程序宣读了长长的法官、检察官、辩护人名单，并宣布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共 48 条。

黄火青宣读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十名主犯的名单，并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五项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其他案犯另行处理。

特别法庭自 11 月 20 日开庭以来，经过一个月的审讯，进入了法庭辩论。在这段时间里，大多数被告温顺地承认了他们的罪行，并与法庭进行了合作。另一方面，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身穿中式棉袄，咬牙切齿地一言不发，江青则极为猖狂地为自己辩护，她反复声称狡辩，她只做了毛主席要她做的事。

12 月 24 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于上午 9 时开庭，进行法庭辩论。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宣布开庭，命令法警：“传被告人江青到庭！”几名女法警和男法警随即把江青带到被告席。曾汉周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 11 月 26 日、12 月 3 日、5 日、9 日、12 日和 23 日上午，先后六次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举手：“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曾汉周说：“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看着长长的起诉状，又一次控告江青：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六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

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

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

检察员江文继续在控告：“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处理。”

讲到这里，江文特别提醒法庭：“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乱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

江文发言完毕，曾汉周对被告说：“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咆哮起来：“那就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曾汉周严肃地说：“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江青说：“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演不成啊！你要有胆

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曾汉周严厉申斥说：“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庭。”江青更加放肆起来：“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再一次警告她：“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江青不但听不进警告，反而进一步咆哮公堂，侮辱法庭。曾汉周按铃警告她：“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江青站起身要求：“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曾汉周允许了。江青的这篇辩护词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到这时候了，她还迷恋着造反有理。1981年2月23日，在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审判以后，特别法庭开始宣判，十名主犯判决结果如下：

特别法庭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江犯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被依法改判为无期徒刑，她1991年身患癌症，于病痛和绝望中自杀。

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被依法改判为无期徒刑。

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犯于服刑期间患肝癌，病死狱中。

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3年保外就医，被安置在青岛，不久病逝。

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1983 年保外就医，随妻居于济南，每日写回忆录。

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1983 年保外就医，现居太原。

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1983 年保外就医，现居西安。

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保外就医后，现居太原。

随后，上海、北京等地法院，分别对林、江两案中的其他罪犯分别作出了各自应得的法律判决。

至此，一场被西方学者称为“一次纽伦堡式的审判”宣告结束。

重新评价历史

公审林、江集团之前，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在全面展开。

1978 年 9 月，平反工作的具体组织者胡耀邦做了大量的指导，在胡、邓的推动下，1978 年下半年，随着实践标准讨论的步步深入，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三次重大成果：

第一，对文革期间被指控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恶攻”案件，进行认真清理，据实平反。

第二，对在“四清”运动中一些地区和单位对一些干

部的错误定性和错误处理，据实纠正。

第三，对 1957 年反右斗争划为右派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属错划的予以平反改正。

三中全会以后，又为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事件被拘捕的 388 人经复查没有一个反革命，全部释放，恢复名誉。还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平反，为薄一波等 61 人叛徒集团一案平了反，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平了反。

三中全会后的这一年内，得到平反的重点人物有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陆定一、周扬等。大案的平反活动有：为 1959 年后历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有右倾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对在 1963 年至 1965 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五六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复查平反；对文革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冤杀错杀的上万例案件进行复查平反。

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定命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一案平反昭雪，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的“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等罪名，恢复他仍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至此，文革的案全翻过来。但邓有错必纠的原则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一直伸展到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历史遗案。他先后为 1955 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了反，为 40 年代延安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为 30 年代根据地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还重新评价了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早期领导人的功过，为他们

恢复了名誉。总之，邓小平几乎把中共的历史重新写了一遍。

到1982年9月，中共中央十二大前夕，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沉冤多年的案件几乎全中得以昭雪。

党在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干部队伍积极性的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其一，从1979年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土改时，给地主、富农划定成分是必要的；由于情况变化，改变他们的成分，也是必要的。

其二，从1979年1月起，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随后；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此员，还落实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政策。

其三，从1979年11月，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者中区别出来。到原八十六万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

其四，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国家开始建立学位制度，恢复评复学术和技术职称，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一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得到安置。

其五，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推动它

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和文教科科技等领域积极发挥作用。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我国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

其六，1980年到1981年，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问题的会议，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中央和一些地方还先后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同志摘掉帽子。

其七，1982年3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文件，阐明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这前后，爱国宗教组织活动得到恢复，各地的寺庙观陆继修复开放，宗教政策得到落实。

其八，重申党的侨务政策，保护和褒扬侨胞祖国、爱故乡的热情，鼓励他们为祖国和家乡的建立做出贡献。

大审判和平反之后，又该如何评价毛泽东，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一道难题。

麦克法奈尔说，“对于中共，毛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如果不谨慎处理对毛的评价，两个形象均可能受到损害，这对党的合法性将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过：尽管审判“四人帮”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

《邓小平谋略》中写道，“为了对毛的错误讲得恰如其伤而不出格，以保证功绩第一，错误第二的分寸，邓小平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文章技法”：

一、60年一起写。评毛的“决议”原计划只涉及建国以来27年的历史。这27年，按公认的评价，只有建国初七年是正确的，“文革”前十年的正确和错误各半，“文革”十年是全局性错误。这些错误都不能不写，但这样写起来，很难体现毛泽东的功绩第一、错误第二。后来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60年一起写。邓认为这个意见很好。60年一起写，虽然超出了“建国以来”的标题限制，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这样就可以相对淡化后20年的错误，使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

二、错误写得概括一些，重点就在正确的方面。后2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错误也不算小。都写出来，恐怕也难保证功绩第一，但又不能不写。于是，邓只好在写法上下功夫，要求把错误写得“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之方面”。邓发现，同样是写错误，但写法很有讲究。例如叙述性的写法有利于反映客观事实，但难于保证恰如其分，所以他主张应避免叙述性写法，而加强论断性语言。就是叙述事实，也有个叙述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上的讲究，纯客观的中性叙述显然不妥。

三、错误别人也有点份。“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尽管毛应对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回避‘我们’。把‘我们’也拉进去，

似乎犯错误的人多了，但“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好处之一是让别的人分担部分责任可以淡化毛泽东的错误份量；二是由现领导人主动承担部分责任，批评起过去的错误来，更站得住脚；三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把批评毛的错误变成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反省，使之永不再犯。

四、“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林彪、“四人帮”等人为了夺权需要，利用毛的错误，把许多东西推向极端，或者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干坏事，这样才造成“文革”那样严重的后果。“文革”后果，不能说毛泽东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所以要算账，首先应算坏人从中破坏的账。

五、“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制度是决定因素”。中国人论人重人品。毛泽东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权威主要源于他的个性魅力。如果把毛的错误归咎于他的不良品性，很容易恶化毛泽东，同时对指出错误吸取教训很不利。邓强调制度起决定作用，强调环境对个人的反作用，一方面可以冲淡毛的错误份量，维护了毛本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为他以后从制度上总结文革教训，开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六、“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但是“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也是个分寸问题。

七、“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犯错误”。同林彪、“四人帮”所犯的罪行有原则的区别。

八、“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样，尽管毛犯了严重错误，但不伤害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不影响现在的领导人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通过以上细致的工作，邓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既严肃地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又没有出格，即没有突破毛泽东一生功绩远远大于错误的原则界限。尽管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件，但邓小平并没有出格。这样，既公正地评价了毛的功过是非，也避免了重蹈东欧和苏联兄弟党的覆辙。

第三代集体领导 的核心是江泽民总书记

“没有迹象表明，邓在任何时候想过要攫取党的主席、总书记或总理职务。相反，他却迅速地把他预期的接班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给他们职位和职责，以便使他们能获得经验和尊敬。这是毛曾提到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一种接班人培养方法。”

麦克法奈尔如此精辟地分析邓小平的政治谋略和智慧。

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

同时，更年轻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担任了总书记和总理之职主持一线工作，而他自己则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在“第二线”指挥着整个党和政府的运行。“这种形式对邓来说，虽然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却有两大好处。

首先有利于邓下一步要考虑领导班子年轻化。

其次，邓因为放在后面，可以避免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社会试验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一旦出现大的风浪，整个新班子不至于都折进去，在后面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

这已经为以后的改革历程多次证实。

1984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深圳经济特区是1979年邓小平主持决策兴办起来的，他当时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

几年时间，深圳经济特区已显示出对外“窗口”和开放基地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央还批准兴办了珠海、汕头、厦门等一批经济特区，在对开放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进一步发挥了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在二十世纪三十到五十年

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第一步解放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是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十二大确定了这一战略规划。

到1986年3月以后，他逐步形成了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整个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完整战略设想。

同年6月，邓小平又作出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的论断。在此前后，他多次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1984年是邓小平思维十分活跃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还完善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祖国的统一找到了切实的道路。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出现了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十三大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党的十三大还第一次从十二个方面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党的十三大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自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积极探索、开拓，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后，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在全国形成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进一步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并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

第三代领导人核心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党和人民把邓小平的名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联结在一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

《邓小平谋略》在评价这次南巡讲话的历史意义时，有如下评述：

南巡选在十四大召开之前，邓选择这样的时候说这些话，是经过深谋远虑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有记者想知道邓小平是否参加这次大会，他对这次大会会有什么影响？新闻发言人刘忠德回答：邓小平同志是本次大会的特

邀代表，他今年年初的南巡谈话为这次大会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十四大亮出班底使人看到邓的谈话还为这次大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邓可不作毛晚年那种危险的平衡游戏：找一个似乎两边都可以接受的领头人来综合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十四大确定的班子整整齐齐，清一色的改革派，不改革的一个不要。凡是想动摇基本路线、对改革开放三心二意的人，真如邓所说，都被人民“打倒”了。曾经以为左比右保险的人，这一次统统失算，有的没有保住，有的勉强保住。

邓的另一聪明是不把百年大计的赌注押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靠不住，要靠一个领导集体，从上到下，从核心到四周都是改革的。趁自己还能起作用的时候就组织好一个真心实意拥护改革开放的领导班子执掌国脉，这样，身后出现“复辟”现象有可能性就很小。毛泽东晚年煞费苦心没有解决的问题，邓可望解决。

第三代领导集体选好了，可以保证这一代人中政变不了。第四代，第五代怎么办？那时候管不了，他也没有打算用自己的思想去规定下几代人的选择。但是邓有一个更深沉的考虑：坚持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后，就会慢慢形成一种典型的制度。那时候制度将起决定作用，人的因素就不那么重要了，少数人想变也变不了，想动摇也没有那个能耐。

这种看法似乎是麦克法奈尔关于“接班人”问题的延伸。麦克法奈尔也许没有看到毛、邓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毛泽东并不反对自己被称作“旗手、舵手、统帅、导

师”之类；而相比之下，邓小平对此并无太多的关注，反倒乐于接受“总设计师”这个称号。

一位美国记者问及为何不见公众场合挂邓小平的照片时，他自己这样答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

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

《北京青年报》1994年12月28日发表的《公众调查》表明，在众多有关邓小平的称号中，几乎所有群众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称号完全准确；97.4%的人关注邓小平的新闻；90.5%的人知道邓小平有打桥牌、游泳、看足球等业余爱好；人们最熟悉的邓小平文章著作是他的“南巡谈话”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92%的人认为邓小平在健康时退休是对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民主进程的一大贡献。

也许，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人格精神。一个伟大的业绩是否成功，最终还是由人民来评说的。

《人民日报》与天安门事件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最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是亿万人民积怒在胸的一次总爆发，终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

事隔二十多年，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知道得并不具体、详细；“四人帮”及其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这一事件中做的坏事，人们知道得也有限。但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每当人们回忆这件往事时，常为不知其细节而流露出几分遗憾。基于此，作为一名记者，又曾经是《人民日报》社清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负责人之一，感到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和史料记录下来，做些弥补的工作。

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

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的消息，开始不时地传到编辑部，人们的心情变得万分沉重，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无限忧虑。虽然同时也传来了邓小平复出的喜讯，2月邓小平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央决定恢复他的组织生

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协助周总理整顿和恢复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国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是当时形势总是朝着与大多数人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事情很快又变得更糟了。报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所谓当代“大儒”的调门愈来愈高，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同时也指向了邓小平。同志们莫不感到失望，心情更加沉重。

1976年1月8日，正是光明与黑暗决斗的前夕，周总理不幸逝世，全中国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但是，“四人帮”一次又一次地下禁令，限制《人民日报》进行报道。人们泪流满面，围在报社门口阅报栏前，阅读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的情景；不尽的人流，从长安街慢慢地走向北京医院那间小房子，与周总理告别时失声痛哭的情景；北京200万市民扶老携幼，冒着刺骨寒风，肃立十里长街，默默向周总理致最后敬礼的情景……所有这些历史性场面，都不准我们报道，残酷地蹂躏人民对周总理深切怀念的感情。

9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11日，姚文元蛮横地改变《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成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为此，姚文元打电话给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不要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登些抓革

命方面的东西”。

14日，周总理追悼会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一文。文章开头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真是弥天大谎。这一天，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寄托哀思。《人民日报》一、二、三版竟然没有出现一点悼念总理的文字，多么冷酷无情哟！姚文元还得意地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清华大学的迟群说得更露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四人帮”和他们的心腹，总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改变民心、夺得民心，扭转当时的局面，但他们忘了，自古以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时局面是他们改变不了的。广大读者看了14日的《人民日报》，纷纷提出抗议，电话铃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中国科学院一位女同志在电话中说：“《人民日报》没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心情，今天发清华的大变化，不代表群众。你们应该到天安门前去采访、拍照片，把这些报道出来，反映群众的心情。”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寄还《人民日报》社。鲁瑛等人将电话记录整理成内部情况，送姚文元。姚文元删去其中对报纸提意见的内容，专门保留对报纸进行声讨的词句，并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的标题印发，为镇压群众制造舆论。

在报社内部，鲁瑛等人规定：不准举行悼念仪式，不

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去天安门广场，去了的要追查。还扬言凡是去天安门的，“不管干部、家属、小孩，该撤的撤，该批的批”，甚至恐吓说：“也可以圈起几个来嘛！”但报社许多同志对这些禁令漠然置之，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人有增无减。报社新闻研究所还铸锋相对地编了一个悼念周总理专辑，登在他们编的内部刊物《报纸动态》上。姚文元一看，凶相毕露，咒骂说：“谁叫你们干的？是要翻案吗？要反革命吗？”

大家强忍悲愤，警惕的目光更加注视着“四人帮”及其一伙，看他们在周总理逝世后如何动作。

王洪文要记者“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

当“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删去3月5日一篇文章中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接着又在3月25日一篇文章中抛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等反对周总理的言辞后，长期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3月29日，英勇的南京人民纷纷举着花圈，走向雨花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并在街头贴出“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标语。很快，声讨“四人帮”的烈火在许多地区相继燃烧起来。首都天安门广场的革命活动，就是这一斗争的继续

和发展，并形成了中心，又影响和作用于全国各地。

“四人帮”凭着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大火必将烧到自己身上，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与惊恐，露出了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从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江、张、姚给鲁瑛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

一是给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

二是诬陷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欲将他们置于死地；

三是打击敢于起来与他们作斗争的群众；

四是出谋划策，为他们篡党夺权加紧制造反革命舆论。

现摘录几条示众。

3月30日王洪文电话：

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瑛答：有记者。）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4月2日15时40分姚文元电话：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电话：

是否可以写这样一篇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大

方向》。首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大好，取得了很大胜利，党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已很孤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第二段，要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等。

最后，要批邓，警惕转移斗争大方向，多讲几句。要写得短，气要足。

4月4日姚文元电话：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你们内部要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要继续批邓，不要听信谣言，听到要追查。

4月5日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坐镇小楼，用电话指挥记者：

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4日抓了三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盯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仅这几个电话，已足能看出“四人帮”要干什么了。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4月3日这一天，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艳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姚文元下令写《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这篇社论的。社论每段写什么，引什么语录，他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

排。

社论写成送审时，姚文元又在文中加了“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的口号的阶级实质”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两句充满杀机的话。

社论4月6日见报。5日深夜，也就是“四人帮”对广场上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广大群众下毒手的同时，姚文元给鲁瑛打电话，反复叮嘱要把这篇社论“明日登一版头条加框”，要鲁瑛“告诉新华社今日播，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还对鲁瑛说，“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请看，姚文元对他亲自炮制的这篇社论是何等重视。可以这样说，4月6日社论是他4月3日日记的翻版，是他那一帮人当时心态的反映，是杀人的反革命信号。

《情况汇编清样》欺骗 主席、中央，并诬“邓小平为 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

从4月1日到5日，《人民日报》根据“四人帮”提前定的“反革命性质”，突出采写、编发了12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经姚文元修改同意后，再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这些《汇编》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制造了许多假材料、假情

况，欺骗毛主席、党中央。

天安门广场上最大量、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民深切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要反映情况，当然首先要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但“四人帮”心虚，害怕这些，一见花圈、诗文、悼词就删；一见群众反对他们，就怒火冲天，统统一笔勾销。留下的则是一些诬陷不实之词和罗织的罪名。

且看他们是怎样陷害群众的。4月3日《情况汇编清样》中提到一个署名“青年工人丁亮”的《倡议书》。作者以大无畏精神，揭露“四人帮”是“从内部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要篡夺领导权，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倡议书》结尾指出：“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姚文元作贼心虚，在《清样》中把《倡议书》全文删去，而恶毒地将“说共产主义空话”篡改为“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这么一改，痛斥“四人帮”是说共产主义空话的修正主义者的《倡议书》作者，竟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反革命了。

许多当时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会看到科学院一〇九厂用大字在四块牌子上书写的四句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也登在4月3日的《清样》上。姚文元竟在诗后批道：“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

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于是，这个500多人的小厂，有3人被抓进监牢，30多人被隔离审查，近百人被“过筛子”，厂领导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厂党委全部改组。姚文元这个刀笔吏，就是这样杀人不见血的。

再看他们是怎样诬陷邓小平同志的。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与事件毫无关系。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大多数悼词和诗词根本没有与邓小平有关的内容。鲁瑛等人捞不到材料，就想从小平同志的亲属身上打主意。

邓小平有一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4月2日，《情况汇编清样》上登了该所放录音的情况，第二天姚文元就打电话让鲁瑛了解的是什么录音。鲁瑛等心领神会，立即派记者去查，还要记者通过“内线”，搞所谓深层情况。4月4日，这位记者没有搞到录音内容，却有“意外收获”。他向指挥摘内参的头头汇报说，听说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室做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巨星陨落神州内外赞光明正大痛悼英烈，挥泪操戈举国上下恨阴谋诡计怒斥妖魔。”还听说小平女儿和其他人一起将花圈抬到广场。头头听后如获至宝，要他赶快写出来，还说：“不要小看这一二百字，可重要啦！”其实，邓小平女儿根本没有抬花圈去广场。他们这样写的目的，就是极力要说明花圈、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

就在同一天晚上，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

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比半导体研究所的材料更为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用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正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去说。”

4月5日晨，姚文元在这从手抄件上批道：“此情况已口头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过，文字稿送毛远新同志阅。”“四人帮”对这个材料断章取义，恶毒篡改，把小平同志诬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篡改事实真相，炮制出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

4月7日，形势急转直下，谁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快。这天早晨，鲁瑛奉“四人帮”之命，带着几名编造天安门事件情况的记者和那几份《情况汇编清样》，赶到人民大会堂。一见面，姚文元得意洋洋，劈头就说：“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公开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粗点没关系”，“题目也不要变”。张春桥说：“在清样基础上写，不要另写。”

大会堂内，“四人帮”额手相庆；大会堂外，群情激

愤，像火山喷发的岩浆。善良的人们怎知一场更大规模的镇压就要来临。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他们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王洪文当面赞扬：“你们有功劳！”江青情不自禁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并关心地问：“你们挨打了没有？”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头子纳吉。”鲁瑛等受宠若惊，即时改编，把张、姚这些话统统塞进了公开报道。还特别强调，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编写中间，姚文元不断过来催促：“快点编，陆续发排，没有车可用警卫车。”就这样，他们编一页，马上送报社排印、打样。几辆小汽车来回穿梭，为大造杀人舆论，急如星火。

大会堂里的气氛，很快传到了编辑部。同志们虽已感到眼下无法挽回大势，但并不绝望。大家只要一想到天安门广场那潮涌一般的群众情绪，就充满信心，并相互鼓励：，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4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登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颠倒黑白、充满谎言的报道。在所谓“反动诗词”、“反动传单”、“冲入人民大会堂”、“烧汽车”、“烧营房”等一系列涉及天安门事件性质的问题上，“四人帮”都不择手段地掩盖事实真相，并进行篡改。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仅举报道中所引“反动诗词”为例：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

鞞。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这首诗就完全是“四人帮”篡改、拼凑起来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先将这首诗的原文引述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得安息。
掏尽红心，
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
挥尽血泪，
难倾满腔悲愤。
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
功高日月，声震环宇。
国际史上，
永载您的音容笑貌；
革命路上，
踏遍您的稳健足迹。
风云涌，鬼神泣，
巨星一陨天地哀，
四海五洲下半旗。

可笑群魔不自量，
妄想重翻腥风血雨，
鼓唇摇舌，捧裾牵裾，
猿猴沐冠，什么东西！
让那伙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总理精神万代传，
子子孙孙举红旗。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安息吧，

敬爱的周总理。”

鲁瑛登《清样》时先删去前 16 行，即从“敬爱的周总理”到“四海五洲下半旗”，还有最后两行“安息吧，敬爱的周总理”。姚文元审《清样》时，又删了 11 行，即从“可笑群魔不自量”到“子子孙孙举红旗”。后面倒数第五、第六行“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姚文元和张春桥各删一行。这还不算，他们又从《清样》中找来另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拼凑到这首诗里。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登出后，举世震惊，海内外友人议论纷纷，来访者要求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内的读者不约而同愤怒地将报纸撕得粉碎。一位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来信，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 4 月 8 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这是人民对“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的声讨。

“四人帮”仍不罢休。他们继续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使人们相信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真的，邓小平这个总后台也是真的。他们又布置写一篇《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写评论的同志特意到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去了解审查天安门事件案子的情况。这两个单位的负责同志说，他们在审讯中没有发现什么写信要邓小平当总

理、放邓小平讲话录音的材料。有的同志甚至明确讲，天安门事件是《文汇报》攻击周总理的文章引起的。

可是，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去。反映上去了，说真话的同志是要遭殃的。于是，真理被封锁了，谬误得以流传。“四人帮”炮制的所谓“天安门事件蓄谋已久”，“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等等颠倒是非的话，都塞进了4月18日这篇社论中。

尽管“四人帮”造了那么多陷害革命群众和领导干部的舆论，他们追查所谓反革命的工作依然遇到很大阻力。姚文元打电话对鲁瑛说：“追查反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较多，是否要研究一下，写篇社论。”写评论的同志又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了解情况，并告知姚文元要写社论谈“阻力”问题，请他们帮助考虑社论怎么写，是否要写这样的社论。公安部领导同志说，这事要向华国锋同志请示。姚文元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中央派迟浩田进驻报社， 领导报社清查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派以迟浩田同志为首的三人小组进驻报社，《人民日报》获得了新生。不久，我被大

家推举参加领导报社清查工作，从小汤山“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许多同志对我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回到编辑部，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1976年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三人名义报送党中央。

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耿飏同志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一年多过去了，材料如石沉大海。尽管党中央已经采取措施解决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问题，许多无辜被捕者得到释放和平反，但整个整体本身的性质没有改变，因而平反是不彻底的，不少地方有关这方面的人和事，都留有尾巴。

怎么办？我想起了刚刚恢复活动的全国政协，那是民主协商大事、广开言路的地方，我决定带着清查材料到政协会上去呼吁。当时“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之间的斗争还很尖锐，可能会有风险。所以我到政协去发言，事先没有同政协有关负责人打招呼，也没有请示报社领导。万一有什么事，言责自负，可以减轻他们的责任。

1978年2月8日，全国政协文化组开会，我以政协委员身份在会上发了言，吁请委员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努

力。会上，我把报社清查出来的问题，向委员们作了介绍，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吴世昌，杜任之、李初梨、孙家昶等委员，都就天安门事件发了言。

事隔不几天，果然出了麻烦。一天，报社总编辑胡绩伟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严肃地要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稿看。看后他什么都没有透露，只是对我说：“你的发言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来问你调查，不管是谁，你都如实相告。”这使我甚感诧异，并预感到问题严重，但又不便多问。我想，一定是政协写简报向上汇报了。于是，打电话给政协文化组，希望看看简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电话里得知，政协机关也在查问2月8日文化组开会的情况，他们说政协简报写好了尚未发出，上面是看了统战部的简报发怒的。谁发怒？讲了什么？全不得而知。

一个多月后，当时政协文化组组长周扬在一次例会上说：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周扬同志的态度是明显的，他不赞成这种动不动就追查的办法。听了这番话，我精神为之一振，但究竟是什么人要追查我的发言呢，仍是个谜。半年后，1979年1月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上，胡绩伟、曾涛、杨西光、华楠、于光远、王惠德六位同志的联合发言，才揭开这个谜。

原来是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看到中央统战部的简报后，立即召集四大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开会，讲了一通要警惕帝修反的挑拨、把好宣传关之后，转

而厉声训斥：“帝修反在跳，中国也是这样，也有人在跳。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2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这本来是已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他还说，天安门事件这案一定要平反，否则人民不平。他说，有人认为翻天安门这个案，有损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错案真正翻过来，毛主席的旗帜会更加鲜艳。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党员，党员能这样说吗？”知道这些之后，真使我不寒而栗。要不是周扬同志仗义执言，要不是胡绩伟同志尊重事实，不顾自己头上的乌纱帽，顶住了巨大压力，我恐怕早已成了“现行反革命”啦。

其实，当时毛主席的情况，这位领导同志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一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直到他老人家去世的同志回忆说：“1976年清明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日子毛远新时常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之类的话。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5日，毛主席正重病卧床，江青说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

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开会的详细情况。’不多时，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汇报后用红笔在另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这些事实，是任何个人意志都改变不了的。

197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是大快人心事，但首都新闻界胡绩伟、曾涛、杨西光等几位老总，觉得这个宣布没有直接道出乎反这一点，是个不足。于是，他们聚在一起，研究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一种补救办法。经过一番思索，得出了一致意见：由新华社专发一条北京市常委扩大会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新闻，鲜明地提出：“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北京市委扩大会宣布的内容中没有这一提法，因而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事关重大，他们又请来于光远等名士一起再商量。大家觉得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

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因为北京市委宣布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把“四人帮”妄加的“反革命”罪名颠倒了过来，这当然是平反了。

就这样，1978 年 11 月 15 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时，特地认真作了标题，主题强调北京市委宣布的“革命行动”，副题补充说明“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6 日《人民日报》和首都以及地方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照登不误，读者反应非常好，认为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胡耀邦同志看到后，自然明白这条消息的用心，只对胡绩伟说了一句：“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未再多说什么。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包括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会议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这一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公报指出：“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人们至今也忘不了中央这一结论当时在全国引起的欢腾局面。

这就是事实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公正。

粉碎江青“四人帮”的斗争

在毛主席的垂暮的岁月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搞乱全国，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江青一方面迫不及待在伸手要权，一方面恨不得毛主席早一点死，以夺权篡位。毛主席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多次对他们进行揭露和批评教育。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党中央决定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亲历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态度恶劣

1971年，毛主席工作很忙，身体每况愈下，我们非常为他的身体焦急，而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却对此漠不关心，很少过问主席的健康。到了1972年1月25日主席气喘喘地说：“张耀祠，请你同医生去钓鱼台，给江青谈一谈我的病情！”

当天下午3时，我们乘车去了钓鱼台。江青当时正坐在沙发上养神，护士叫醒了，他，我们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医生对她说“主席现在患肺心病，开始由感冒引起支气管发作，每日阵咳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困了，就在沙发上睡一会儿，打个盹，从入冬以来一直不好。”

江青听了，摇摇头，表示怀疑。她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

原本给江青汇报希望能引起她的重视，没想到江青却持这种态度。

我接着说：“主席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抵抗力弱了，有病应该休息和及早治疗，可是，这两条主席很难做到。他日夜操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有病不能休息，也不治疗，不愿打针吃药，他的病拖的时间太久了，病的发展就越糟。现在，他的双脚浮肿，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江青慢腾腾地说：“有什么变化，要及时报告我，我好有个思想准备！”

什么“思想准备”呢？

我们在江青这里谈了三个小时，她为什么无动于衷呢？非要坚持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呢？后来她的思想行为就一点一点地往外冒了。

1月28日晚12时。

我和医生进到主席卧室，主席正躺在沙发上，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摸着摸着，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我急切地问：“怎么样？”

医生摇摇头说：“没有摸到脉。”

当时我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医生转身给汪东兴打电话，请他马上来游泳池，并商量请总理来。

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我马上就来。”

总理考虑到主席已是 79 岁高龄的人了，工作这样紧张，身患重病，应该请江青来看望主席，家属可以配合医生为主席治病，正是由于这一点总理亲自给江青打电话，请她来主席这里，主席病重。

周总理、汪东兴等到江青来后，医生把主席的病情作了简单的汇报，然后一块来到主席的卧室。

主席这时已经醒了，江青刚一见主席就拉大嗓门讲道：“我说，主席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厉害呢？”她气狠狠地说：“医生护士谎报军情，”她接着讲道：“不要打针吃药，吃药反而不好！”

江青离开毛主席的卧室来到值班室，蛮不讲理，闹得更凶。她死咬住一条吼道：“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们所讲的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

这时，医生护士一肚子的怨气不好发作。我站在一边没有吭气，周总理、汪东兴同志也没有说什么。

江青闹了一阵，没有谁去搭理她，悻悻地离开了游泳池。

本来，主席这期间在打针吃药，进行治疗，可江青这么一闹，主席生气了，针不打了，药也不吃了，使医生护

士们非常为难。

过了两天，医生护士对主席说：“主席，还是治病要紧，不要为江青同志那些话生气了。”

主席非常平静地说：“那么多意见，怎么治呀！”

经劝说，主席同意打针吃药了。

1月31日晚8时，江青来看主席，她在主席那里坐了十二分钟，主席没有跟她讲一句话，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仿佛对江青有很多愤懑。可江青出来却对我说：“主席的脸色比我好，很神气，只吐了一口痰，眼睛瞪得大大的，与你们谈的完全不一样。”

我长嘘了一口气，对江青说：“主席今天还没有睡觉，已吃过两次安眠药了。”

江青说“不对”，她觉得说的话不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也希望主席好，你们要沉着，不要慌张，我并不是否定主席的病情，要看到好的嘛！”

对于主席的治病，江青也做做样子，表示她很关心和重视，但是没有想到江青所做的这种“样子”连她自己也被骗不过去。2月2日晚12日，江青约周总理、姚文元以及我和五位医生，在怀仁堂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

可是江青在会上避开主席的病情不谈，专谈她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不好，说自己浑身都是病，一个劲儿地抱怨别人对她的健康问题关心不够，她整整谈了三个小时。我坐在那里感到非常纳闷：不是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吗？怎么总是谈她自己呢？

我当时沉着个脸，连总理都没有插话的机会，我们这

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只好陪着她，听她没完没了地谈。

最后，江青终于看到了我的脸色，一本正经地冲着我讲道：“你不要愁眉苦脸，你们责任重大。不是我不同意主席打针吃药，是主席不同意打针吃药。你们要做好准备。”

次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江青告诉汪东兴同志：“让张耀祠同志去怀仁堂参加会议！”

汪东举转告我说：“今晚8时，你去怀仁堂开会，我留下来值班。”

江青在会上摇头晃脑地讲道：“主席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江青再一次恶狠狠地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

这一番话，江青讲了两遍，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只是听听而已，没有一个人附和她的意见，江青显得非常孤立。

江青每次来主席这里，都要向工作人员询问主席的病情如何，使工作人员非常为难。说真情，江青便骂骂喋喋；一句不讲，江青也大发其火，说“你有敌对情绪”。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在2月6日下午特意向我们交待：“今后江青如果要问病情，你们不要说，说也说不清楚。”

2月6日晚8点钟，江青来了。像以往一样，江青问

道：“今天主席的病情怎样？”

我对江青说：“主席今天指示，今后不要说病情，说也说不清楚。”

江青“吭”了一声，到了主席的卧定，不多会儿就出来了，气鼓鼓地对我说：“你今天有敌对情绪！”

我说：“我没有敌对情绪，我是执行主席的指示！”

江青没好气地说：“引起病人的不安不好，不要无事生非，有人告我的状。当然要听主席的话，你们不要紧张，不会否定你们的成绩。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放松警惕！”

等到主席身体状况平稳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总理、江青、汪东兴来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边工作人员的，他当着周总理、汪东兴的面，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一席话，说得江青垂下头来，暗中更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毛主席突然休克

毛主席由于过度疲劳，加之他的肺心病伴严重缺氧，病越发严重起来。在他的住处，都存放着氧气筒，二十四小时都放着氧气，以保证室内氧气充足。

1972年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主席突然出现休克，把我们都吓坏了，这是主席第一次这样发作，弄得医生护士手忙脚乱。当时是护士长吴旭君值班，她的工作精细认真，极端负责。看到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显得很安然。她摸了摸主席的脉，没有摸到，便立即叫医生快来。

这时，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急急忙忙赶到了，和医务人员一起马上对主席进行紧急抢救。顿时，整个空气都紧张了起来。胡医生口述所需要注射的药物，他讲一句，吴旭君重复一句，生怕忘记和弄错了所需要的药物，她牢牢地记在心上。备完注射药物，即往针管里抽，然后由吴旭君向主席体内注射。

此间，主席一无所知，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他安然地躺着。

注完药物，胡旭东扶起主席，有节奏地用手拍打主席的背部，不停地呼叫：“毛主席，毛主席！”

张玉凤也帮着拍打主席的背部，深深地叫着：“主席，主席！”

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赶来了，他指示：“你们要用全力抢救。”他沉重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

经过紧张抢救，主席慢慢地睁开双眼，他见到眼前围着他身边的人后，才知道自己刚才休克了。醒过来的主席显得神态安详，他幽默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经主席这么一说，经历了一阵紧张时刻的工作人员，只有在这时才轻松地笑了，总理也笑了。

张玉凤同志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跟前，主席喘着气说：“谢谢你们！”并请他们到沙发上坐坐。

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

主席的健康状况是绝对保密的，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级党政军领导人，都不知道主席的身体如何。要说知道，那也只是接外宾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般情况。

主席身体康复后，同医务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块合了影！

周总理为了鼓励医护人员和在主席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自己出钱搞了两桌饭犒劳大家。饭吃得很香，心情也特别愉快；但这餐饭也有遗憾之处，那就是总理因工作太忙，没有同我们一起用餐。

中央决定，在主席病重期间，由周总理、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的领导。

江青是怎样为 自己的后路做准备的

1973年10月的一天，江青要来见主席，打电话给张玉凤。张玉凤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她要来就让她来吧。”

不多会儿，江青来了。

谁知她一走，主席气喘喘地对张玉凤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分我的财产稿费了。”

过了两天，主席叫张玉凤到特会室取了三万元。

张玉凤吃了一惊，是三万元，在那个时代，三万元钱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张玉凤把钱送到钓鱼台，亲自交到江青的手上，江青看到只有三万元，嫌少，对小张说：“小张，三万元对你们来说，不算少了，对我来说是不够开销的。”江青拿了这笔钱叫张玉凤替她保管。

1975年7月，江青给张玉凤写了一张条子：“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新华社八千元，从1969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不然怎能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用具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她还要毛主席再给她八千元。

主席从来就是非常节俭的，没有吃完的饭总是叫大师傅下一餐热了再吃。李讷小的时候吃饭总是往桌上掉饭粒，主席常常就讲农民种地不容易。毛主席进北京只做过一双棕色皮鞋，皮鞋穿得很旧了，也不愿再做新的，买来的新布鞋他往往让卫士穿旧了自己再穿。主席处处想到的是老百姓，是穷人，很少顾及他自己，他身边的卫士大部分都得到过他的“救济”，谁家有困难或是遭了灾，他知道后总是要慷慨解囊。当然得到他的补助的同志谁也没有主动伸手找他要过，而江青不愁吃不愁穿，却厚着脸皮要了三万嫌少，还再要八千元。

主席后来对我们讲道：

“鲁班到终南山学艺，出师时，老师送给他一把斧子，并说，有人用斧子为自己挣下了一座金山，有人用斧子在人们心中刻下了一个名字，你是选择那一中呢？鲁班毫不犹豫地回答：选择后者。我们共产党人手中都有一把斧子，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江青想拿这把斧子去挣一座金山，她也会在人们的心中刻下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是万世臭名！人啊，要有志向，这种志，是中华民族之志，是共产党人之志。

毛主席非常坚定地说：

“共产党人的志不能仅仅写在党章上，而要写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落实到行动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箭齐发，只瞄一箭

1974年1月，江青乘主席病重期间，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不请示毛主席，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叶剑英同志，打电话给周总理，决定在1月24日和25日召开驻京部队、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这两天会议，都是由江青一伙事先找迟群、谢静宜在钓鱼台精心筹划的，江青要迟群和谢静宜在会上发言。

“四人帮”在这个大会上不批林，假批孔。实际的是“走后门”，三箭齐发，只瞄一箭，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身上。江青在会上批评周总理，说他“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批评叶剑英和老干部送子女当兵“走后门”，要限期从部队中退回来等等。

谢静宜说：“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一讲批林批孔的问题，孔夫子是一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不批臭他，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他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说：“代表反动的孔老二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我们要坚决批臭臭这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都要把他拉下马。”

谢静宜又说：“‘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不坚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

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迟群发言，语调也是杀气腾腾的，他说：“还有那个走后门的问题，批林批孔不是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

迟群讲完，江青没好气地对总理说：“总理，你说说吧。”总理接过话筒，说：“我是来参加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但我事先也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走后门’的问题，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敏感，有点落后于形势！”

会后，江青把两次大会的录音和材料带到钓鱼台，用了三天时间精心修改和复制，准备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企图在全国再次掀起一个批林批孔和批“走后门”的运动，把全国再次搞乱，以便混水摸鱼，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

一次江青得意忘形地说：“哈哈，如今，周总理都叫我们搞得没办法了。”

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当即指示：“不要发录音，发了录音的要马上收回。”这样，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

1974年1月28日，我们把江青“1.24~1.25”的两次万人大会的讲话录音拿来放了一次，其中江青念了一首诗，说是毛主席写的，现在有许多书刊在写这一段历史时，都引用了这首诗。该诗不长，只有四句，其曰：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我们把录音连放了两次，真正把该诗记录了下来，交

给了主席，先后两个工作人员，问道：“主席，江青说这首诗是你写的，你看是吗？”

主席拿着这首诗，看了看，摇摇头说：“我没有写这样的涛。不知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也不至于如此。”

后来根据工作人员和机要秘书回忆，都说主席没有写这样的诗。大家认为，可能此诗是江青自己杜撰的，用这种形式来欺骗群众，整倒郭老。

面对主席的批评，江青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反而紧逼叶剑英同志限定时间把当兵的子女调回来。

叶剑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便把自己的子女情况给毛主席写一封信，1974年2月15日，毛主席看后在信上批了一段话：“此事甚大，从部队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批林批孔还是要告这些老干部……”严厉批评了“四人帮”。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了周总理，请他负责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江青是中央委员，她看到主席的批示，气急败坏地质问总理：“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不给我看呢？”

周总理说：“主席叫我印发的。”总理把主席的批件送给江青，江青仔细看完批件，眼睛一瞪，哑口无言。对于这两次会议，在主席多次批评后，王洪文迫于形势，不得不作了几句检讨。1975年5月，王洪文在他的检讨提纲中写道：“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日两次大会。虽然我对于两

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的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但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这伙人就是这样的，明知不对就是不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这一事实证明，他们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处处阳奉阴违。

主席最反对拉帮结伙

1973年3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强调指出，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总理感到这是一个解放老干部问题的机会来了。这天他来看望主席，并向主席报告了有无数的老干部挨整，他们一直没有工作等情况。主席说：“你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我也是无意的把他们打倒嘛，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老同志受罪嘛！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烧糊了就不好吃了。”总理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主席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都是林彪、江青“四人帮”干的，平心而论，主席是不知道的，他们都瞒着主席四处整人。

1974年3月时一天，江青要求见主席，主席不愿意

见。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年3月20日

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下午3时，与会人员均陆续到了会场。

这时江青来了，尽管她尽力地向人展示出一种首长的派头，但仍然掩饰不住心中那种受训的刺痛，显得很不自在和拘谨，以往的那种高傲和主角的派头不见了。就在这次会议上，主席点名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主席接下来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不好呢，你的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也就在这个会上主席当着大家的面指着江青说：“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这就是主席讲的上海帮的由来。

毛主席宣布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开完政治局会议，毛主席离京。7月19日到了武汉，9月29日离武汉去长沙。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主席说：“江青，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又严肃指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呢？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好，历来不好。”“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早在4月27日的政治局的会议上作了点儿自我批评。当主席在5月3日指出“四人帮”的严重危害性后，江青不得不于6月28日写了一封遮人耳目的欺骗信：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是开得好的。政治局比过去团结多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

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

江青

江青身边的护士多是从 8341 部队调去的，一个个都是经过挑选审查好了的。最先向我诉苦的是小许同志，她在江青那里呆了三年多时间，其中先后四五次向我哭诉说：“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折磨。”她请求说：“首长，你把我调走吧！”

我非常同情小许同志，但是我不得不考虑到主席的情绪。当时我劝道：“不要计较她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还是要看在毛主席的面上，多忍耐，要顾大局。”

小许的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她对江青的服务情况，我感到是做到家了的，然而她被江青扣上帽子，赶了出去。

小许走后，又把小赵调了去，没过多长时间，小赵同志又哭哭啼啼找到我，说：“江青无故地发脾气，无事找事，常说，你是‘特务’、‘反革命’，你要害我，你走路把贼风带来了。逼得我们好惨！”

几年时间里，小赵也是找了我好几次，我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小赵劝了回去。最后仍然是被扣上帽子赶出了钓鱼台。

有一次我对汪东兴说：“江青如果再要调护士，我再也不给她了。”以前，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汪东兴管，后来汪东兴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其实，我也难以处理好这些事情。

这些护士最惨的是小周同志。小周在江青这里也是干了好几年，江青对她百般摧残，动不动就骂，罚她长时间跪在地上，最后江青对她进行逼供审讯，戴上“特务”、“反革命”帽子，投进了监狱，把人逼疯了。

最不可饶恕的是，她把一个忠实可靠、很有才干的秘书阎同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达七八年之久。

毛主席知道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行为，恼怒极了。有一次，毛主席指着江青的鼻子，严厉斥责：“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

主席生完气，江青走了。主席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他长叹着气说：“江青使我背上了一个政治包袱。”

此后，毛主席不愿多见江青了。

伸手要官要权

1974年10月17日。

江青一伙人正背着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开会，筹划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商议，觉得自己的如意算盘如何拨拉，必须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于是决定让王洪文去长沙见毛主席。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背着有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不通知警卫部门，自己向空军

要了一架专机，秘密从北京飞抵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得知王洪文来长沙，赶到机场迎接。汪东兴要我去接王洪文。13点15分，我接上王洪文离开机场，我便直接将他送到主席的住处。

王洪文见到主席，询问了主席的身体情况，然后就讲道：“主席，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的会，最后商定让我来向主席汇报的。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主席静静地听着。

王洪文讲道：“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进一步强调说：“主席，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主席反问道：“是吗？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哇？”

王洪文见主席熠熠发光的眼神，颤颤地说：“是的，主席！总理虽然有病都忙着找人谈话，嗯……”

王洪文“嗯”了好长时间，他灵机一动，转变话题，在主席面前对春桥、姚文元、江青分别作了一番吹捧。

这时主席一声没有吭。王洪文见到主席没有任何表示，最后只好讲道：“今天我还要赶回去，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主席此时一脸正色，他语重心长地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

要注意她。”主席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主席最后说：“你在政治思想上不强，你们这些人的职务也够高了。”

一席话说得王洪文心里像倒了味瓶。当日下午7时15分，王洪文连招呼也不打就愤愤地离开长沙回北京了。

早在1969年4月，在召开党的九大前夕，有人给中央来信，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在他们企图由“四人帮”“组阁”。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回京后，主席于11月12日亲笔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但是，江青并不听主席的告诫。11月19日，江青给主席写了一封“检讨信”，信上说：“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我认为这些话并不是江青的内心话，在她的信的末尾才是她写信的真实意图：“自九大以来，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主席看了江青的检讨信说：“这不是检讨，分明是伸手要权，她的权还小吗？”毛主席一直没有给她发号施令的实权。

主席回信再次批评了江青：“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职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

说没有工作。此囑。”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其野心仍然不死。1974年10月18日，她把王海容、唐文生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二人在陪外宾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她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经常往总理那里跑，没日没夜地去干什么？是搞阴谋活动，周恩来是后台。周恩来和邓小平不分白天黑夜地频繁活动，很像1970年林彪搞的那一套，是篡党夺权活动。现在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不能不提高警惕呀！”说到最后，江青说：“在人事安排上我建议让王洪文当副委员长。”

10月20日，王海容、唐文生陪着丹麦首相哈特林来到长沙见到毛主席，等外宾走后，她们向主席转达了江青的“人事安排”意见，主席毫不客气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主席说：“你们回去，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不要跟在江青的后面批东西。”“江青有野心，到处伸手，她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要向群众讲话。总而言之，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她不能代表我。”

江青不善罢甘休，再次找到王洪文说：“10月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什么！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时，不是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地位权力是争来的，不是谁人恩赐的，你再进行一次拼搏，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不能怕这个三长两短，关键时刻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快到嘴的东西你不去争，不去抢，难道还要别人喂到你嘴里来吗？我为你当委员长，费了多少脑子，采取了多少措施，

你知道吗？只有你再去一次，你不去谁去呢？

王洪文说：“江青同志，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好心，我辜负了你的一片期望。船到码头车到站，官当大了，怕失去位置。现在我们并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还要斗争，要拼搏，不然我们所得的一切，也可能被人家抢去。哪怕是万丈深渊我也要跳，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我去长沙向主席面谈，再力争一次。”

江青高兴地说：“这才是好样的，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怕什么，顶多挨几句批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抓住，就不能放弃，这叫‘寸权不让，寸权必争’，必须要争。”

正好12月23日，周总理约王洪文一起去长沙，同乘一架飞机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他既不吭声，也不与总理同行，独自乘坐一架飞机去长沙。

一天，王洪文按江青的意见去找主席谈。讲着讲着，主席生气了：“你上次来我是怎样批评你的？我告诉过你多次，不让你和江青搅在一起，你不听，你们几个人拉帮结伙搞在一起，这是错误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你在这里呆两天，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错误。”

王洪文说：“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

王洪文唯唯诺诺说罢，向主席告辞回到了住所，写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检讨。就是这个不像样的检讨，也没有交给主席。到1976年10月6日把王洪文

逮捕后，才在他的抽屉里把检讨抄了出来。其中写道：“两天来，我认真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主席发现后曾多次指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我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我不是全面地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的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主席对周总理说：“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了，我对她作了许多工作，她就是不听。她搞了三件事，‘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

总理沉默了好长时间。

当总理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主席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让小平同志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总理说：“人才难得。”主席放下笔来说：“是喔是喔！”

这样“四人帮”终于没能改变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

排。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十届二中全会于1975年1月8日在北京召开，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人大会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会后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决定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江青一伙深感这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

这天她又把王海容、唐文生叫去，把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王、唐把她的意见报告给主席。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唐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江青不死心，于1975年1月23日乘飞机来到长沙，她见到主席，主席开言道：“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江青于27日愤愤地离开长沙，回北京去了。

江青深感历史对她不公平，借古喻今，为自己登上权力的峰颠摇旗呐喊。1976年3月2日，江青擅自召开十一省、自治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提出“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她还表露了想当“女皇”的野心，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

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主席知道后批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一省谈话。”

穷于心计抓军队

江青一伙早就筹划着要把军权抓到手。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在会上，江青点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陈亚丁回去你要动一动了”。“春桥同志，看来要夺军权，军队文化工作还是让亚丁去管起来，你在军委提一下”。江青以部署性的口气说：“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江青还说：“亚丁的问题，军委备个案。”张春桥说：“那没问题！”

此后，部队工作中的报告、文件和信是写给军委的，但江青不送给军委主管部队工作的叶剑英同志，而往往是批给了洪文。他们秘密放火烧总后、烧总参，搞得人心惶惶。

江青甚至想把火烧到毛主席的身边来。一天，她跑到游泳池，对主席讲道：“8341部队是跟林彪的，靠不住。”

毛主席没好气地批驳说：“8341部队是跟林彪的，林彪为什么要搞大小舰队呢？有8341部队就够了么！林彪逃跑，8341部队一个也没有被带走嘛！8341部队是一支

好部队！”

江青的阴谋没有得逞，又生一计。一天她向汪东兴提议：“让迟群到 8341 部队当政委，你看怎么样？”

汪东兴说：“迟群不能当政委，如果要她去当政委，必须报告毛主席的同意。”

后来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反问道：“迟群怎么能当政委呢？”

8341 部队当时有八个大队，数千人，是一支林彪害怕、江青一伙千方百计想抓到手的部队。但是，任何野心家、阴谋家都未能得逞。

江青没抓住军队，便决定搞第二武装。

1974 年的一天，江青同王洪文、张春桥说：“现在我们怎样把军队抓过来呢？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步棋。现在都抓晚了……”“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我们搞第二武装，造反派还是听我们的话。把民兵组织起来。发给枪支弹药，进行军事训练，到了节骨眼上时，把这支队伍拉起来，是可以同他们较量一番的。”

江青看着王洪文说：“洪文，第二武装，你在上海先搞起来。那是你的根据地，人熟地熟，又有群众基础。”

王洪文点头说：“给民兵的武器，要现代化的机枪、大炮、甚至火箭等都应装备齐全，不管出了什么情况，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武装。‘权’肯定不是靠别人恩赐，而是靠我们自己去夺取。”

王洪文多次到上海去，经过精心策划把武装部改为民兵指挥部，另立系统，受“四人帮”一伙操纵，并力图把

它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王洪文直言不讳地说：“把我这支队伍（民兵）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要把现有的民兵武装牢牢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此后几年，王洪文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上海擅自扩大组织，增加经费，生产军火，储备物资。

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窜回上海，接见了市委和民兵指挥部部的头头，他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挥部，把武装部合并进去。这不是一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你们可要给我抓好。现在你们要作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来，我们是否站得住。”

主席逝世后，上海民兵工作更加紧锣密鼓了。他们在主席病逝的第二天，就决定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以加强“第二武装”。1976年9月12日，张春桥、王洪文请徐景贤秘密从上海来到北京，要他汇报民兵准备工作情况。

徐景贤说：“民兵现在可以应付一阵了。”

张春桥说：“你回去抓紧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能只应付一阵子。要抓紧搞好战备，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海民兵责任重大，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谈完话的当天，王洪文去上海检查战备落实情况，回到北京后，江青找到王洪文说：“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王洪文说：“上海没有问题，我刚回来，已经部署就

绪，过几天，准备再去检查落实一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北京。如果这里的军队控制在我们手里，就什么也不怕了。”

其实，王洪文并不放心，23日又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叮嘱“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

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去上海，向市委常委传达他的指示：“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阶级斗争是曲折的，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过严重考验，林彪要在上海搞都没有成功。”

“四人帮”商议了分头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

江青到了北京昌平某部。

王洪文到了保定某部。

张春桥到了通县某部。

他们分头串连拉拢煽动部队跟他们走，但是谁也不理他们，没有拉动一个。解放军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江青大闹政治局

1976年9月29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和北京及外地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

江青气哼哼地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帮腔，说什么“今后要加强集体领导，为了保证不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在今晚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

一时间空气异常沉闷。

很显然，要求讨论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让她当党中央主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而，江青一伙错误地估计形势。过去政治局的同志对江青的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多是谅解她，谁要说个不字，谁就会遭到厄运。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毛主席选定了第一副主席后，这自然让江青没了份，即使要大吵大闹，许多政治局的老同志也都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主持正义，顶住她。这时，王洪文、张春桥把江青“抬”出来，立即就遭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

这时，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这样的：我是主席的联络员，是从辽宁来的，主席现在去世了。我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我觉得返回辽宁好。

华国锋念完信，当即表态：“我同意毛远新同志回辽宁。”那四个人一听，都语无伦次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

其实，毛远新给华国锋同志的信是江青一伙人事先策划好了的，想以此来试探对他们的真实态度。没想到华国锋同志一下子砸烂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江青瞪着眼讲道：“毛远新不能回辽宁，要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报告，他还要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同志没好气地盯着江青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来参加后事呢？”

这时江青气得青筋暴胀，高声吼道：“我什么时候讲的，我根本就没有讲，这是栽赃，这是诬陷！”

江青的撒泼，在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看到了。也就在这时，汪东兴出来作证：“江青是讲过她与毛远新不参加主席的后事！”

在证人面前，江青脸面大扫，立刻又哭又闹，她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张春桥见此情景，马上打圆场道：“还是这样吧，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

江青也拿出演员的技巧，也不哭不闹了，她说：“对，还是把主席的文件、材料交给毛远新。这样做，我放心！”

叶剑英这时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文件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保管。”

会议对峙到次日凌晨。江青眼看难以实现自己的意愿，再一次哭闹起来：“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

这话，好像政治局会议是由她在主持，由她发号施令。

华国锋同志长叹着气，说：“这样，叶剑英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先走，其他的同志留下来，还是不要走。”

江青非常强硬地说：“不行！”

王洪文也附和道：“无关的都走！”

叶剑英愤然离席。接着有几个委员相继离开会场。汪东兴没有走，他怕会出现更加可怕的情况。

江青又开始喧嚣起来，感到无关的人员还没有走完，死死扭住华国锋不放。华国锋同志不耐烦地说：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

张春桥也跟着讲：“毛远新不能走，还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华国锋同志马上讲道：“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华国锋说：“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的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华国锋同志毫不客气地说：“即使三中全会要做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

讲完，华国锋站起来说：“散会！”

1976年10月1日至5日，江青等先后去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七厂等单位频繁活动，到处发表演说，蛊惑群众。她在清华大学居心险恶地说：“有人要迫害我，有人要弄死我。他们绑架了我一次，我准备被绑架第二次。我随身带了一把剪子，准备自卫。我向你们年轻人宣誓：‘我要斗，我还能斗，我要锻炼好身体，跟他们斗’。”

江青还散布谣言：“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

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江青也在为自己梦想登基制造混乱。她对一些群众讲道：“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讲，生产力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一席话，讲得一些师生员工一个个睁大了眼睛：这江青究竟懂不懂政治经济学，懂不懂生产力的概念呢？

江青外出的这几天，不告诉警卫部门，而是让她的亲信派民兵给她站哨。

10月3日，王洪文窜到北京郊区平谷县，他问人家：“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党中央决定：粉碎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做到一网打尽。

这项行动，由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部署，汪东兴同志负责组织实施。

从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分成四个小组，分别交待任务。

10月6日下午3时，汪东兴找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的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中央决定

在今天晚上 8 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还交待了逮捕方式，“你去了向她说：“找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

我当时对汪东兴说：“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江青一伙正在蠢蠢欲动，加紧篡权，党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是在这关节点上。我们必须先下手。

当我们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一看表，才下午 4 点，离晚上 8 点还有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中，勾起了我许多往事的回忆，越发感到江青罪大恶极，恨不得马上去抓她。等呀等呀，觉得这四个小时特别漫长。

时间到了，我们随即出发。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 201 号楼，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我和武健华等人在晚上 8 时，先到毛远新的住所，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了起来，马上关了电视。

我即宣布：“毛远新，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宣布

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不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的住所很近，我和武健华 20 点 30 分来到了她的住所。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江青，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由于对江青极大的愤恨，我当时说的“你现在还讲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是我临时加上说的话。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未发一言。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这样几个字：“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作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着江青出来。外面江青平时用的小车和一直跟着她的司机在外面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

其实，早在 1975 年 5 月 3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

不了，后年解决。”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但是，它表明了毛主席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时间。在他生前没有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在他逝世后的第 27 天，在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地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借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

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次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发表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

标准”，一个个都象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

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 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建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其中的一个生动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

《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产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

“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

其中说：1955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时时处处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

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 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来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

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

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

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

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届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现在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